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公约第 6 条适用指南
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刑事部分)



出版商或有关组织希望出版或在网上公布（或翻译）本报告的，请联系 publishing@echr.coe.int，咨询相关信息。

©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2014

本报告可于以下地址下载 www.echr.coe.int（Case-law – Case-law analysis – Case-law guides）

关于报告发表的最新动态请关注法院的推特账号

<<https://twitter.com/echrpublication>>.

本报告由法律专家理事会下的研究部提供，对法院没有拘束力。报告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未来还可能经历编辑修改。报告的翻译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安排下进行，由中国人民大学修订。

目录

读者须知	4
I. 适用范围：“ <i>刑事指控</i> ”的概念	5
A. 一般原则	5
B. 一般原则的适用	7
II. 向法院申诉的权利	10
限制	10
III. 一般保障：制度要求	12
A. “审判机构”的概念	12
B. 依法设立的审判机构	12
C. 独立性和公正性	14
IV. 一般保障：程序要求	18
A. 公正原则	18
B. 公开审讯	27
C. 合理的时间	30
V. 具体保障	33
A. 第 6 条第 2 款：无罪推定	33
B. 第 6 条第 3 款：辩方的权利	37
VI. 第 6 条的域外效力	52
A. 公然违背公正原则	52
B. “真实的风险”：审查标准和证明责任	52
援引案例一览	54

读者须知

读者须知

本指南是欧洲人权法院（以下简称“本法院”、“欧洲法院”、“斯特拉斯堡法院”）出版的公约指南系列的一部分，旨在让执业律师了解斯特拉斯堡法院作出的基本判决。本指南分析和汇总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欧洲公约》）第 1 号议定书第 2 条的判例法。读者可以从中发现本领域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判例。

援引的判例法选取了具有指导性的、重要的以及最新的判决。

本法院的判例不仅用于审判呈交至本法院的案件，而且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用于阐释、捍卫和发展《公约》创立的各项规则，并以此促使各缔约国对之加以遵守（*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978 年 1 月 18 日, § 154, Series A no. 25.）。因此，从普遍意义来说，《公约》确立的此机制的任务便是通过决定公共政策的各种问题来提升人权保护的标准，并在缔约国范围内推广人权法学（*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 [GC], 30078/06, § 89, ECHR 2012）。

第6条 - 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1.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构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2.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在未经依法证明为有罪之前，应当推定为无罪。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a) 以他所了解的语言立即详细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b) 应当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辩护作准备；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援助费用的，则基于公平利益的考虑，应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d) 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具有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

(e) 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I. 适用范围：“刑事指控”的概念

第6条第1款：

“1. 在决定……□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任何人有□……受到……□判机构的公平……的□□。”

A. 一般原则

1. “刑事指控”的概念有着一定的“自治”意义，与各成员国国内法律体系中所规定的分类相独立（[Adolf v. Austria](#), § 30）。

2. 必须在公约的范畴内来理解“指控”的概念。因此，可以将其定义为“由当局针对个人做出的、声明其已犯下刑事罪行的官方通知”。这个定义同样呼应了判定“犯罪嫌疑人的状况是否受到了实质影响”的测试（[Deweert v. Belgium](#), §§ 42 and 46; [Eckle v. Germany](#), § 73）。法院也认为，受警方看管并被要求作为证人在受询问前宣誓的人，也已经是“刑事指控”的对象，并有权保持沉默（[Brusco v. France](#), §§ 46-50）。

3. 从“刑事”的自治定义来说，《公约》并不反对各缔约国所采取的“去刑事化”行动。去刑事化之后的行为在缔约国可能已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仍然可能属于《公约》所定义的“犯罪”的范畴。因此，如果让各缔约国自由裁量排除这些罪行，可能导致违背《公约》意旨的结果（参见 [Öztürk v. Germany](#), § 49）。

4. 从以下标准出发，判断是否可以适用公约第 6 条刑事部分——这些标准在恩格尔等人诉荷兰案（[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82-83）中得以确立：

- (1) 国内法的分类；
- (2) 犯罪的性质；
- (3) 相关人员可能受到的刑罚的严重程度。

5. 作为起点，第 1 条标准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若国内法把一项犯罪规定为刑事犯罪，那么可以适用《公约》第 6 条的刑事部分。反之，法院将根据国内法的分类，查明所涉程序的实体内容。

6. 第 2 条标准较之第一条更为重要（[Jussila v. Finland](#)[GC], § 38），在适用时，将考虑以下因素：

- 所涉的法律规则是仅仅针对一个特定群体，还是具有普适性（[Bendenoun v. France](#), § 47）；
- 诉讼是否由具有规制性执法权的公共机构提起（[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 该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惩罚性或威慑性目的（[Öztürk v. Germany](#), § 53; [Bendenoun v. France](#), § 47）；
- 是否必须在定罪的前提下才能施加刑罚（[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 在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中相应的程序是如何归类的（[Öztürk v. Germany](#), § 53）。

7. 第 3 条标准是由相关的最高法定刑来决定的（[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72; [Demicoli v. Malta](#), § 34）。

8. 在恩格尔等人诉荷兰（[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85）案中确立的第 2、3 条标准不需要同时满足，只需满足其一即可；若要适用公约第 6 条，可以是所涉罪行在本质上属于公约意义上的“刑事”罪行，也可以是行为人因该罪行所受的惩罚从本质上和严重程度来说属于普遍意义上的“刑事”范畴（[Lutz v. Germany](#), § 55; [Öztürk v. Germany](#), § 54）。即使一项

罪行不会被判处监禁刑，其仍可能成为一项刑事罪行，不能因刑罚较轻而否定其刑事性质（[Öztürk v. Germany](#), § 53;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 26）。

然而，如果单独分析某一标准无法明确判断是否构成刑事指控时，可以同时参考这两项标准（[Bendenoun v. France](#), § 47）。

9. 在用到术语“刑事指控”（“*criminal charge*”）以及“被指控刑事犯罪”（“*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时，第 6 条的三款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情形。因此，第 6 条刑事部分的适用性对于这三款而言是完全一致的。

B. 一般原则的适用

1. 纪律处分程序

10. 由于违反军纪而被纪律部门监禁数月的情形，可适用公约第 6 条刑事部分的规定（[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85）。另外，法院认为，两天的逮捕期间太短，不属于“刑事法律”范畴（同前注）。

11. 对于职业纪律处分程序是否适用刑事部分的问题并没有定论，因为法院认为这种程序是民事性质的，而无须作出刑事判决（[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30）。在这一案件中，当事人受到了强制退休的纪律处分，法院认为，只要国内当局确保其决定只在纯粹的行政范畴之内，这种程序就不属于第 6 条所定义的“刑事”范畴（[Mouillet v. France](#) (dec.)）。法院还认为，军队长官因触犯纪律而被开除引起的纠纷不适用第 6 条刑事部分（[Suküt v. Turkey](#) (dec.)）。

12. “适当考虑”到监狱环境以及特殊的监狱纪律制度，《公约》第 6 条也可以适用于违反监狱纪律的罪行，这取决于指控的性质以及处罚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在厄泽和康纳斯诉英国案（[Ezeh and Connor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82）中，两名申诉人分别被判处了额外的四十天和七天的监禁；相反参见 [Štitić v. Croatia](#), §§ 51-63）。但是，原则上，涉及监狱系统的处分程序本身并不直接适用于《公约》第 6 条刑事部分（[Boulois v. Luxembourg](#)[GC], § 85）。因此，将囚犯置于高度监管单位之类的行为并不涉及刑事指控；法院应该根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民事部分的规定，处理针对此种手段及附加限制的申诉。（[Enea v. Italy](#)[GC], § 98）。

13. 一般认为，法院根据扰乱庭审秩序（蔑视法庭）的相关规则下达的措施，不属于《公约》第 6 条的范畴，因为这与行使纪律权力相类似（[Ravnsborg v. Sweden](#), § 34; [Putz v. Austria](#), §§ 33-37）。然而，若国内法将蔑视法庭规定为刑事犯罪，考虑到惩罚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可能会适用第 6 条加以定罪（[Kyprianou v. Cyprus](#)[GC], §§ 61-64，关于一项监禁五天的刑罚）。

14. 对于蔑视议会，法院区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立法机构规制其内部侵犯议员特权的行为；另一方面，立法机构的管辖权得以延伸，可以惩罚来自非议员的外部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前者被认为是纪律处分性的，而对于后者，考虑到普适性以及可能施加的惩罚的严重程度，法院将其认定为刑罚（在 [Demicoli v. Malta](#), § 32 一案中，判处了长达六十天的监禁，并处罚金）。

2. 行政、税收、海关、金融以及竞争法诉讼

15. 以下行政违法行为可能适用第 6 条刑事部分的规定:

- 某些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可能课处罚金或限制驾驶的, 例如处罚扣分或剥夺驾驶资格 ([Lutz v. Germany](#), § 182; [Schmautzer v. Austria](#); [Malige v. France](#));
- 构成妨害或扰乱治安的轻微违法 ([Lauko v. Slovakia](#);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 25-26);
- 触犯社会保障法的违法行为 ([Hüseyn Turan v. Turkey](#), §§ 18-21, 此案中处罚的是没有申报就业的情况, 不过罚金不高);
- 宣扬并传播煽动种族仇恨的行政违法行为, 可受行政警告以及被没收涉案出版物的 ([Balsytė-Lideikienė v. Lithuania](#), § 61)。

16. 基于以下的要素, 第 6 条曾适用于税收滞纳金诉讼中:

- (1) 规定处罚的法律适用于所有作为纳税人的公民;
- (2) 税收滞纳金的目的并不在于补偿经济损失, 而是主要作为一种惩罚来防止行为人再犯;
- (3) 罚以税收滞纳金的依据是一项兼有威慑性和惩罚性目的的一般规则;
- (4) 税收滞纳金数额巨大 ([Bendenoun v. France](#); 相反地, 参见 [Mieg de Boofzheim v. France](#) (dec.) 一案中迟缴的利率)。

虽然一些税收滞纳金很低 (在 [Jussila v. Finland](#)[GC], § 38 一案中, 滞纳金仅为重新评估后应缴税款的 10%), 但其刑事本质可能使其足以适用第 6 条。

17. 第 6 条刑事部分曾适用于海关法 ([Salabiaku v. France](#)), 适用于拥有预算和金融问题管辖权的法院判处的处罚 ([Guisset v. France](#)), 以及适用于某些有权处理经济、金融和竞争法领域问题的行政机关 ([Lilly France S.A.v. France](#) (dec.); [Dubus S.A. v. France](#); [A.Menarini Diagnostics S.r.l. v. Italy](#))。

3. 政治问题

18. 第 6 条刑事部分不适用于涉及选举制裁的诉讼 ([Pierre-Bloch v. France](#), §§ 53-60); 政党的解散 ([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 (dec.)); 议会委员会的调查 ([Montera v. Italy](#) (dec.)); 以及针对一国总统明显触犯宪法的弹劾程序 ([Paksas v. Lithuania](#)[GC], §§ 66-67)。

19. 对于肃清程序, 法院认为其具有强烈的刑事含义 (违法行为的性质—不真实的肃清宣告—处罚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长时间禁止从事特定职业), 因此可以适用第 6 条刑事部分 (([Matyjek v. Poland](#) (dec.); 相反的情形, 参见 [Sidabras and Džiautas v. Lithuania](#) (dec.))。

4. 驱逐和引渡

20. 虽然在刑事诉讼中可能涉及对外国人的驱逐程序，但是这一程序并不适用于第 6 条刑事部分（[Maaouia v. France](#)[GC], § 39）。引渡程序（[Peñafiel Salgado v. Spain](#) (dec.)）及欧洲逮捕令的相关程序（[Monedero Angora v. Spain](#) (dec.)）均同样排除适用第 6 条刑事部分。

21. 与此相反，将徒刑变更为驱除出境十年，可以基于与最初定罪时相同的原因而被认定为一种处罚（[Gurguchiani v. Spain](#), §§ 40 and 47-48）。

5. 刑事诉讼，辅助程序以及后续救济的不同阶段

22. 为了预防混乱或犯罪而采取的措施不适用《公约》第 6 条（警察的特别监督—[Raimondo v. Italy](#), § 43；一个青年人非礼同校女生，警察对其警告—[R.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23. 在庭审前（询问，调查）的阶段，法院将刑事诉讼视作一个整体。因此，倘若违背第 6 条的相关要求有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话，这些要求比如合理期限或者辩护权的行使就可能也需要在这些阶段予以考虑（[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6）。虽然预审法官并不决定一项“刑事指控”，但其所采的步骤对接下来包括实际庭审在内的诉讼程序的进行和公正性有直接影响。因此，预审法官可能在调查阶段适用第 6 条第 1 款，虽然该款的某些程序性保障可能无法适用（[Vera Fernández-Huidobro v. Spain](#), §§ 108-114）。

24. 第 6 条第 1 款适用于“刑事指控”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包括量刑程序（例如，让国内法院评估没收数额的没收程序 [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第 6 条刑事部分同样可以适用于拆除无规划许可的房屋引发的诉讼程序，因为这种拆除可以被视作一种“处罚”（[Hamer v. Belgium](#), § 60）。然而，其不适用于请求根据新的更有利于行为人的刑法条文重新确定刑罚的诉讼（[Nurmagomedov v. Russia](#), § 50）。

25. 涉及刑罚执行的程序——例如执行大赦的程序（[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假释程序（[A.v. Austria](#) (dec.)），基于《被判刑人移管公约》的移管程序（[Szabó v. Sweden](#) (dec.)）（但是也有相反的判决——请参见 [Buijen v. Germany](#), §§ 40-45，），以及涉及执行外国法院下达的没收令的执行令程序（[Saccoccia v. Austria](#) (dec.)）不适用第 6 条刑事部分。

26. 原则上，对于第三方财产权有消极影响的没收措施，在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诉讼威胁时，并不属于“确定一项刑事指控”（比如对飞行器的控制，[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54；对金币的没收，[AGOSI v. the United Kingdom](#), §§ 65-66）。这种措施应适用第 6 条民事部分（[Silickienė v. Lithuania](#), §§ 45-46）。

27. 对于基于法律条文的申诉（[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0），以及宪法诉讼（[Gast and Popp v. Germany](#), §§ 65-66；[Caldas Ramírez de Arrellano v. Spain](#) (dec.)），当这些诉讼是相关刑事诉讼的后续阶段，且其结果对被定罪之人具有决定性作用时，原则上可以适用第 6 条。

28. 最后，第 6 条不适用于案件的重审程序，因为从该条的意义上来说，一个已被定罪且要求重审案件的人并没有“受到刑事指控”（[Fischer v. Austria](#) (dec.)）。只有在重审案件的请求被通过后，新的诉讼程序才能被认定为一项刑事指控（[Löffler v. Austria](#), §§ 18-19）。类似地，

第 6 条并不适用于在本法院判定侵犯公约权利后重审的刑事诉讼（[Öcalan v. Turkey](#)（dec.））。然而，监管审查程序所导致的判决修改适用于《公约》第 6 条刑事部分（[Vanyan v. Russia](#)，§ 58）。

II. 向法院申诉的权利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受到……审判机构的……审讯。”

29. “向法院申诉的权利”在刑事案件中并不比民事案件中更绝对。它受到暗含的限制（[Deweere v. Belgium](#)，§ 49；[Kart v. Turkey](#)[GC]，§ 67）。

30. 然而，这些限制的方式和程度不能损害该权利的核心。作出限制的目的必须是合法的，且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比例（[Guérin v. France](#)[GC]，§ 37，和 [Omar v. France](#)[GC]，§ 34，参考民事案件）。

限制

31. 对于向法院申诉的权利的限制可能来自：

1. 议员豁免权

32. 议员豁免权的两种类型（无责任和不可侵犯）提供的保障出于同种目的——保证议会在执行任务时的独立性。毫无疑问，不可侵犯通过防止任何出于政治目的提起的刑事诉讼，可以帮助实现议会的完全独立性，并保障反对派不受多数派的压力或权力滥用（[Kart v. Turkey](#)[GC]，§ 90，引用民事案件）。另外，对议员提请诉讼可能会影响其所在议会的运作，并妨碍议会的工作。这种作为一般法律特例的免责体系可以被认为是追求合法目的（同前注，§ 91）。

33. 然而，在没有考虑案件具体情形时，无法就该议员豁免是否符合公约内涵下结论。必须明确的是，议员豁免这一限制对申诉权是否构成根本性损害。审查这一措施的合比例性意味着需要考虑均衡以下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保障议会独立性带来的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申诉人的个人利益，即通过排除议员豁免，申诉人得以在法庭上对刑事指控进行答辩。在检验这一合比例性问题时，法院必须特别注意案件的免责范围（*ibid.*，§§ 92-93）。保护议会独立性的措施越少，则越需要更充分的正当性理由（*ibid.*，§ 95）。因此，例如法院认为，议员不放弃其免责权，并不影响其向法院申诉的权利，因为这项免责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临时程序性障碍——但被限定只能在该议员任期内行使（*ibid.*，§§ 111-113）。

2. 程序性规则

34. 程序性规则即对一项申诉的可受理性要求。

35. 虽然申诉权会受到法定要求限制，但是在适用程序性规则时，各法院必须避免过度的形式主义，以免侵犯诉讼的公正性（[Walchli v. France](#), § 29）。有时，过于严苛地适用一项程序性规则，可能会削弱申诉权（[Labergère v. France](#), § 23），尤其考虑到申诉的重要性以及被判处长期徒刑的申诉人在诉讼中的利益（[Labergère v. France](#), § 20）。

36. 程序不当也会根本性地削弱申诉权，例如这种情况：负责检验针对罚金或免责申请提起的申诉是否可受理的检察官，越权对申诉的实质部分进行了判决，从而使得申诉人丧失了本可以得到社区法官判决的机会（[Josseaume v. France](#), § 32）。

37. 这也适用下列情况：一项基于错误理由宣布申诉不可受理的决定导致扣留了与标准罚金等额保证金，因此便认为已支付罚金，且公诉已中止，这就使得申诉人一旦赔偿了罚金后就不可向法院对其受到的道路交通违法指控提出质疑（[Célice v. France](#), § 34）。

38. 另一个例子是过分限制申诉人向法院提请申诉的权利：申诉人针对法律条文申诉，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而被宣布不可受理，但之所以未在期限内申诉，是因为当局未能恰当履行下级法院判决施加给申诉人的义务，当时申诉人处于拘留中（[Davran v. Turkey](#), §§ 40-47）。

3. 实施先前判决的要求：

39. 已发出针对申诉人的逮捕令，而申诉人不服从逮捕，其针对法律条文提出的申诉被自动判为不可受理：

- 一项针对法律条文的申诉因申诉人潜逃而被宣告不可受理：考虑到辩护权的重要意义以及民主社会的法治原则，这会构成一项不合比例的惩罚（[Poitrimol v. France](#), § 38；见 [Guérin v. France](#), § 45；和 [Omar v. France](#), § 42）；
- 一项针对法律条文的申诉仅仅因为申诉人拒绝接受逮捕而被宣告不可受理：该逮捕令是由被申诉的决定下达的，虽然在申诉判决下达后或申诉期限届满前，这项决定并不具有终局性，但这项决定使得申诉人提前被剥夺人身自由。这对申诉人施加了不合理的负担，因而打破了保证司法决定被执行的合法考虑与向上诉法院的申诉权及辩护权之间的平衡（[Omar v. France](#), §§ 40-41；[Guérin v. France](#), § 43）。

40. 这同样适用于因不接受逮捕而丧失针对法律要点的申诉权的情况（[Khalfaoui v. France](#), § 46；[Papon v. France \(no. 2\)](#), § 100）。

41. 然而，出于道路交通违法范围内防止拖延或无理申诉的目的，在超速罚款申诉前提交押金的要求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合法且合比例的对申诉权的限制（[Schneider v. France \(dec.\)](#)）。

4. 其他侵犯了申诉权的限制情形：

42. 例如当局虚假承诺削减一审法院对申诉人判处的刑罚，从而说服其撤诉（[Marpa Zeeland B.V. and Metal Welding B.V. v. the Netherlands](#), §§ 46-51）；或者在申诉人正式指派的律师拒绝

帮助他之后，申诉法院没有告知申诉人针对法律条文申诉的新的时限（[Kulikowski v. Poland](#), § 70）。

III. 一般保障：制度要求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决定.....□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任何人有□.....受到依法□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判机构的.....□□。”

A. “审判机构”的概念

43. 一个纪律性或行政性的机构，即使不被国内法律体系称为“审判机构”或者“法院”，也可能具备第 6 条自治意义下“审判机构”的特点。在本法院的判例法中，一个审判机构的特征在于其实质意义上的司法职能，也就是依据法治原则以及法定程序对问题进行判决。审判机构同时还必须满足其他一系列进一步的要求：独立性，特别是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正性；其成员有一定任期；程序性保障——其中一些要求在第 6 条第 1 款中有所体现（参见 [Belilos v. Switzerland](#), § 64；[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9；[Richert v. Poland](#), § 43）。

44. 如果所涉当事人可以针对决定向符合第 6 条规定的司法机构申诉，那么将轻微的“刑事”犯罪起诉和惩罚交由行政机关进行不违反公约（[Öztürk v. Germany](#), § 56；[A. Menarini Diagnostics S. R. L. v. Italy](#)）。因此，行政机构所作的决定本身不符合《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要求的，之后会由“拥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对该决定进行审查。这种司法机构的决定性特征包括有权撤销以下机构针对事实或法律问题的所有决定（[Schmautzer v. Austria](#), § 36；[Gradinger v. Austria](#), § 44；[A. Menarini Diagnostics S. R. L. v. Italy](#), § 59）：例如，行政法院进行一项超越合法性“形式”审查的司法审查，并包括了对行政机关所处惩罚的合理性及合比例性的详尽分析（参见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 R. L. v. Italy](#), §§ 63-67，一项由独立规制机构针对竞争处以的罚款）。即便是法律本身决定了与违法行为严重性相当的惩戒，司法审查仍可能满足第 6 条的要求（参见 [Malige v. France](#), §§ 46-51，关于对驾照的扣分）。

45. 有权做出不可被非司法机构改判的具有强制力决定，本身就属于“审判机构”一词的应有之意（[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7）。

B. 依法设立的审判机构

46. 根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一个审判机构必须“依法设立”。这种表述反映了法治原则，该原则是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建立的保障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Jorgic v. Germany](#), § 64；[Richert v. Poland](#), § 41）。在民主社会中，非依法设立的机构的确不具备听取个体诉求的合法性（[Lavents v. Latvia](#), § 114；[Gorgiladze v. Georgia](#), § 67；[Kontalexis v. Greece](#), § 38）。

47. 第 6 条第 1 款所指的“法律”，特别包括了规定司法机关成立以及相应权限的法律（[Lavents v. Latvia](#), § 114; [Richert v. Poland](#), § 41, [Jorgic v. Germany](#), § 64）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内法，一旦违反，将使得一名或多名法官对于案件的审查不再合法（[Gorgiladze v. Georgia](#), § 68; [Pandjig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 104）。“依法设立”这个词汇不仅仅指审判机构存在的法律基础，也指规制审判机构的法律的合规性（[Gorgiladze v. Georgia](#), § 68），以及每个案件中法官组成的合法性（[Posokhov v. Russia](#), § 39; [Fatullayev v. Azerbaijan](#), § 144; [Kontalexis v. Greece](#), § 42）。

48. 如果依据国内法律审判庭无权起诉被告，就不属于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依法设立”（[Richert v. Poland](#), § 41; [Jorgic v. Germany](#), § 64）。

49. 第 6 条“依法设立”的目标是“保证民主社会司法机关不依据执行机关的自由裁量而设立，而是依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而设立”（[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Richert v. Poland](#), § 42）。在法典化国家，司法机构对司法系统的组成也没有自由裁量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无权解释相关的国内法（[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Gorgiladze v. Georgia](#), § 69）。

50. 原则上，违反有关国内司法机关的组成和职权的法律也违反了第 6 条第 1 款。本法院因此有权审核国内法律在此是否适用。然而，考虑到一般首先是国内法院解释其国内法，因此，除非它们的解释明显与国内法冲突，否则法院不会提出质疑（例如比照以下两个案件，[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98 最后; [Lavents v. Latvia](#), § 114）。因此本法院的职责仅限于审查司法机关的设立是否有合理依据（例如，[Jorgic v. Germany](#), § 65）。

51. 在下列案件中，本法院认为这些机构不是“依法设立的审判机构”：

- 上诉法院对共同被告中除了被诉官员以外、与被诉官员受审案件有关联的人进行了审判，然而法律没有规定这样的连带规则（[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107-108）；
- 在一起违反了抽签规则以及每年最多提供两周社区服务的规定的案件中，由两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法庭进行审判（[Posokhov v. Russia](#), § 43）；
- 由非职业法官组成的法庭决定依据已有的旧法继续审理案件，尽管旧法被申诉而新法还未制定（[Pandjig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 108-111）；
- 法庭的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其中两名法官依据法律不具备审理该案件的资格（[Lavents v. Latvia](#), § 115）。

52. 在下列案件中，本法院认为审判机构是“依法设立的”：

- 德国一法院对行为人在波斯尼亚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进行审判（[Jorgic v. Germany](#), §§ 66-71）；
- 为审理贪污和有组织犯罪而设立的特别法庭（[Fruni v. Slovakia](#), § 140）。

C. 独立性和公正性

53. 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要求案件由依法设立的“独立公正的审判机构”审理。独立和客观公正这两个概念间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法院常常会将这两个要求结合起来考虑（[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3）。

当判断某个审判庭是否“独立公正”时，所适用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职业法官、非职业法官以及陪审员（[Holm v. Sweden](#), § 30）。

1. 独立的审判庭

a. 一般原则

54.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要求审判庭保持独立，不受执法机关、立法机关和党派的干涉（[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55. 尽管在法院的判例法中，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之间分权的概念越来越重要，但不管是《公约》第 6 条还是其他条款都没有要求国家遵守任何理论上的宪法概念，这些概念涉及的是权力相互作用可允许的最大限度。问题始终在于，所涉及的特定案件中是否满足了公约的要求（[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 46）。

b. 独立性的审查标准

56. 法院在判断机构是否“独立”时遵循下列标准（[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3）：

- i. 其成员的任命方式；
- ii. 其成员的任期；
- iii. 是否存在针对外界压力的保障；
- iv. 该机构形式上是否独立。

i. 机构成员的任命方式

57. 不能因为法官仅由议会直接任命就对其产生质疑（[Filippini v. San Marino](#) (dec.)）；[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58. 同样，如果行政机关任命的法官在审判时能够不受影响或压力，这样的任命方式也是允许的（[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 49；[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79）。

59. 尽管国内当局对某一案件的法官或法院的安排享有自由裁量权，该安排也必须符合第 6 条第 1 款，特别是符合关于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要求（[Moiseyev v. Russia](#), § 176）。

ii. 机构成员的任职期限

60. 任职期限没有规定最低年限。通常来说，法官在任期内的不可撤职性是独立性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在法律上正式承认这一点，不意味着缺乏独立性。假如事实上这一点得到了确认，并且也得到了其他的必要保证，那就说明具有独立性（[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80）。

iii. 针对外界压力的保障

61. 司法公正要求每一个法官都不受司法机关内部或外部不合理的压力。内部司法独立性要求法官不受其他法官的压力或指令，也不受法院内承担行政职责的人员例如院长或部门领导的压力或指令。如果对法官的独立性缺乏足够的保障，特别是针对上级压力的保障，那么本法院很有可能认为申诉人对该国内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质疑是合理的（[Parlov-Tkalcic v. Croatia](#), § 86; [Daktaras v. Lithuania](#), § 36; [Moiseyev v. Russia](#), § 184）。

iv. 形式上的独立性

62. 为了判断一个审判庭是否符合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独立”要求，形式标准也非常重要。就刑事程序而言，民主社会中法院必须具有公信力，这一点非常重要（[Sahiner v. Turkey](#), § 44）。

63. 在确认是否有合法的理由质疑某一法院的独立性或公正性时，被告的立场很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该质疑能否被客观证明。如果本法院认为在所涉案件中，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没有理由担心，那么独立性就不存在问题（[Clark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64. 当审判庭中的某一成员就其职责和服务而言，相对于团队中的其他人处于下属地位时，被告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该审判庭的独立性（[Sahiner v. Turkey](#), § 45）。

2. 公正的审判庭

65.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要求审判庭保持“公正”。公正通常表示没有偏见，而且经得起各种方式的考验（[Kyprianou v. Cyprus](#)[GC], § 118; [Micallef v. Malta](#) [GC], § 93）。

a. 公正的审查标准

66. 法院区分了下列两种方法:

- *主观方法*，即确认特定案件中特定法官的个人信仰或利益;
- *客观方法*，判断法官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排除任何合法的质疑（[Kyprianou v. Cyprus](#)[GC], § 118; [Piersack v. Belgium](#), § 30; 和 [Grieve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69）。

67. 然而，这两种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因为法官的行为不仅从外人看来在公正方面存疑（客观检验），也有关于个人信仰的因素（主观检验）。因此，一个案子适用何种方法，或是两者都适用，取决于被检验行为的事实（[Kyprianou v. Cyprus](#) [GC], § 119 和 121）。

i. 主观方法

68. 在采用主观方法时，法院始终假定法官是公正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Kyprianou v. Cyprus](#)[GC], § 119; [Hauschildt v. Denmark](#), § 47）。

69. 关于这类证明的要求，法院会确认法官是否表现出了敌意或恶意，或是因为私人的原因而得到这个案子（[De Cubber v. Belgium](#), § 25）。

70. 但是在某些案件中难以获取推翻法官主观公正的证据，此时客观公正的要求就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证。本法院确实认识到依靠主观方法难以证明违反第 6 条，因此大量案件侧重于采用客观方法（[Kyprianou v. Cyprus](#)[GC], § 119）。

ii. 客观方法

71. 在对审判庭采用客观方法时，除了成员的私人行为外，必须确认是否可依据确定事实对其公正性提出合理的质疑（[Castillo Algar v. Spain](#), § 45）。

72. 在决定某一案件中是否有合法理由质疑审判庭缺乏公正性时，质疑方的立场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质疑能否被客观证明（[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8; [Padovani v. Italy](#), § 27）。

73. 客观方法主要关注案件中法官和其他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或其他关系，这可以支持对于审判庭公正性的质疑，从而证明没有达到公约的公正性标准（见 [Micallef v. Malta](#) [GC], § 97）。因此每一个案件中受到质疑的关系必须达到足以证明审判庭缺乏公正性的程度（[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74. 在这方面，甚至连形式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一点非常重要，民主社会中法院必须具有公信力，也包括赢取被告的信任。因此，一旦有合法的理由质疑任何一位法官的公正性，该法官必须回避（见 [Castillo Algar v. Spain](#), § 45）。

75. 国内机关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到。各国内保证公正的程序即规制法官撤职的规则也是一个相关因素。这些规则体现了各国立法机关对排除关于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怀疑十分关注，也体现了其试图排除造成怀疑的原因来保证公正。除了减少事实上的偏见，他们也致力于减少形式上的不公正来提高法院的公信力（[Piersack v. Belgium](#), § 30 (d)）（见 [Micallef v. Malta](#) [GC], § 99; [Meznaric v. Croatia](#), § 27; [Harabin v. Slovakia](#), § 132）。本法院在评估一个审判庭是否公正时，特别是申请者的质疑能否被客观证明时，会考虑上述规则（见 [Pfeifer and Plankl v. Austria](#), § 6; [Oberschlick v. Austria](#) (no.1), § 50;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 24-29）。

b. 质疑公正性的两种情形：

76. 有两种情形可能产生对公正性的质疑（[Kyprianou v. Cyprus](#) [GC], § 121）：

i. 第一种与职能相关，比如，司法过程中同一个人行使了多项职能，或者和此过程中的其他人有等级或其他方面的联系；

ii. 第二种与个人品格相关，源于某一特定案件中法官的行为。

i. 与职能相关的情况

• a. 不同司法职能的执行

77. 如果一名负责刑事审判的法官同时还在预审阶段做了包括还押拘留在内的决定，不能仅凭该事实本身认为他不公正，还应该考察这些决定的程度和性质（[Fey v. Austria](#), § 30; [Sainte-Marie v. France](#), § 32; [Nortier v. the Netherlands](#), § 33）。如果还押拘留的决定需要以“有极大可能性”定罪为前提，本法院认为审判庭的公正性值得质疑，申诉人的质疑是可以从客观上证明合法的（[Hauschildt v. Denmark](#), §§ 49-52）。

78. 法官曾是检察部门的一员这一事实不可以成为怀疑其公正性的理由。不过，如果某人在检察部门工作时曾处理过相关案件，而后又以法官的身份处理同一案件，那么公众有权担心其公正性得不到保证（[Piersack v. Belgium](#), § 30 (b) and (d)）。

79. 同一案件中，如果法官既调查又审判，本法院认为申诉人有理由怀疑该法院的公正性（[De Cubber v. Belgium](#), §§ 27-30）。然而，如果审判法官在调查中参与的时间有限，仅仅质询了两名证人，并没有对证据做任何的审核或要求他得出结论，本法院认为申诉人在客观上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法院的公正性（[Bulut v. Austria](#), §§ 33-34）。

80. 在诉讼的其他阶段，如果法官做出的纯粹是形式上或程序上的决定，那么就不存在缺乏司法公正性的问题。然而，如果在诉讼的其阶段，法官表达过对被告罪行的观点，这可能会产生不公正的问题（[Gómez de Liaño y Botella v. Spain](#), §§ 67-72）。

81. 法官曾对相似但没有联系的案件做出过判决，或是在彼此独立的刑事程序中对同一被告做出过判决，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构成对其公正性的合理怀疑（[Kriegisch v. Germany](#) (dec.)）；[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 544）。但如果前一判决所含的事实会对下一判决的被告造成预判，那么另当别论（[Poppe v. the Netherlands](#), § 26; [Schwarzenberger v. Germany](#), § 42;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9）。

82. 保持公正不能被解释为上级法院将行政或司法决定置之一旁，而将案件送至另一个司法机关或本司法机关的另一分支机构（[Thomann v. Switzerland](#), § 33; [Stow and Gai v. Portugal](#) (dec.)）。

• b. 案件进程中和其他参与人在等级或其他方面的关系

• 等级关系

83. 原则上而言，军事法庭对军职人员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和本法第 6 条并不冲突（[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10）。然而，当军事法院的所有成员都是召集人的下级并听从其指挥时，可以认为申诉人有客观理由质疑该审判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76; [Mill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0-31）。

84. 成员中有军方人士的法庭对平民的审判，可以引起人们的合法怀疑，认为法院可能会被偏见影响（[Incal v. Turkey](#), § 72; [Ibrahim Ülger v. Turkey](#), § 26）。即使一名军事法官在起诉公民

的过程中仅仅参与做出了一个中间的但持续有效的决定，整个诉讼都将被认为不是由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Öcalan v. Turkey](#)[GC], § 115）。

85. 在军事法院做出有关公民起诉军队的判决的情形中，对该法院的客观公正可能产生合理的质疑。一个司法系统中，如果军事法院有权对非军事系统的公民审判，那么即使有足够的安全措施保障法院的独立，也很容易会导致本应存在于法院和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消失。（[Ergin v. Turkey \(no. 6\)](#)， § 49）。

86. 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军事法院对平民的刑事指控决定才符合第 6 条规定（[Marti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4）。

- **其他关系**

87. 当案件调查组组长是申诉人的丈夫时，质疑该审判庭的公正性是客观合法的（[Dorozhko and Pozharskiy v. Estonia](#)， §§ 56-58）。

88. 审判庭的某一成员与案件中的某一证人私下认识时，这不必然意味着他会偏向于采信该证人的证词。每一起案件中都必须判断此种联系是否足以导致缺乏公正性（[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陪审团的一名成员是两名关键的控方证人之一的员工；[Hanif and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1， 陪审团一名成员为警察）。

ii. 与个人品格相关的情况

89. 在审理案件时，为了体现法官公正无私的一面，司法机关被要求行使最高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此种权力要求他们不利用媒体，即使是受到挑衅。这项义务是对司法的更高要求，也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庄严性（[Lavents v. Latvia](#)， § 118；[Buscemi v. Italy](#)， § 67）。因此，如果法院院长在主持法院判决之前公开表示对申诉人不利的观点，可以认为有客观理由怀疑他的公正性（[Buscemi v. Italy](#)， § 68；也可见 [Lavents v. Latvia](#)， § 119， 一名法官参与了对辩方的公开批评，并对该被告辩护无罪的情况公开表示惊讶）。

90. 国家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国家法官检察官联盟在媒体上发表声明或文章，批判了审判时的政治环境、政府的立法改革措施和辩方策略，但没有对申诉人的罪过做声明，这种情况不视为违反了第 6 条。另外，听审申诉人案子的法官，全部是富有经验、接受过训练的职业法官，这使得他们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Previti v. Italy \(dec.\)](#)， § 253）。

IV. 一般保障：程序要求

A. 公正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受到……审判机构的公平……的审讯。”

1. 平等手段原则和对抗程序

91. 平等手段原则是公正审判的内在特征。该原则要求双方都有合理的机会陈述案情，以使自己不处于下风（[Foucher v. France](#), § 34; [Bulut v. Austria](#); [Bobek v. Poland](#), § 56; [Klimentyev v. Russia](#), § 95）。平等手段原则要求各方保持平衡，并且同等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92. 参与对抗式庭审的权利意味着原则上各方对引证证据或影响法院判决的观点都有知悉、评论的机会。参与对抗式庭审的权利与平等手段原则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在某些案件中，法院会同时依据这两个概念判定行为违反第 6 条第 1 款的规定。

93. 本法院的判例法有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越来越重视程序形式，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也越来越多（[Borgers v. Belgium](#), § 24）。

94. 刑事案件中，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的特别保证重合，尽管第 3 款不仅限于第 1 款规定的最低权利。事实上，第 6 条第 3 款的保证是组合概念，包含了第 1 款列举的公正审判的概念。

a. 平等手段原则

95. 博格斯诉比利时案（[Borgers v. Belgium](#)）中，法院限制了申诉人的权利，禁止申诉人对检察官提交给上诉法院的意见进行答辩，申诉人也无法获得副本。在法庭的审理下，检察官作为顾问的身份参与其中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96. 法院发现下列刑事诉讼中的情况既违反了第 6 条第 1 款，又违反了第 3 款：辩方律师必须等待十五个小时，直到次日清晨才得以有机会辩护（[Makhfi v. France](#)）；同样地，本法院在某最高法院审查一起刑事案件中也发现了违反平等手段原则的情形，申诉人在上诉中被判定有罪，但其出席一场秘密预审听证会的请求被拒绝（[Zhuk v. Ukraine](#), § 35）。

97. 相反，由于没有充分的理由，一项关于平等手段原则的请求被宣布不予受理。申诉人提出公诉人与涉诉方相关。但从辩护其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被告并没有处于不利位置（[Diriöz v. Turkey](#), § 25）。

98. 未能制定关于刑事程序的法律也有可能违反平等手段原则，因为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被告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而这类法律的缺失或不明晰最容易导致辩方受侵害（[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102）。

99. 控方和辩方的证人必须得到平等对待；然而，是否违反了该原则取决于证人是否实际享有特权（[Bonisch v. Austria](#), § 32；相反地，参见 [Brandstetter v. Austria](#), § 45）。

100. 不向辩方披露证据会违反平等手段原则以及参与对抗式庭审的权利）（[Kuopila v. Finland](#), § 38，辩方无法对警方补充报告发表评论）。

101. 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理由，限制被告获取个人材料文件的权利，这也违反了平等手段原则（[Matyjek v. Poland](#), § 65）。

i. 对抗式庭审

102. 在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中，基本点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包括任何诉讼中的刑事部分程序，都应当是对抗制的，辩方和控方享有平等权利。参与对抗式庭审的权利意味着，在一起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都有机会了解评论另一方上交的报告和提出的证据。另外，第 6 条第 1 款要求控方必须向辩方提供其掌握的所有有利或不利于辩方的物证（[Row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60）。

103. 在刑事审判中，第 6 条第 1 款经常和第 6 条第 3 款的辩方权利重合，例如询问证人的权利。

104. 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不向辩方披露证据时，本法院不会审查该命令。相反，本法院会尽可能地审查做出该命令的程序，是否符合对抗制程序、平等手段原则的要求，以及是否有充分的保障措施保护被告的利益。

105. 在罗、戴维斯诉英国案（[Row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中，本法院认为有违反第 6 条第 1 款的情形，控方未能向主审法官提供相关证据，使得法官无法对披露问题做出判决，因此剥夺了申诉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然而，在贾斯珀诉英国案（[Jasper v. the United Kingdom](#)[GC]（§ 58））中，本法院认为未披露的材料不属于诉讼案件的一部分，无需向陪审团提交，因此判定没有违反第 6 条第 1 款的情形。

106. 然而，披露相关证据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譬如国家安全、保护证人不受报复以及对警方调查案件的手段保密，这些必须和被告的权利进行权衡。在某些案件中，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是重要的公众利益，有必要不向辩方披露特定的证据。然而，只有确实需要时，第 6 条第 1 款才允许对辩方权利进行限制（[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8）。另外，为了保证被告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任何造成辩方行使权利的困难都必须在之后的程序中经过司法机关的充分衡量（[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2;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4）。

107. 在爱德华兹、路易斯诉英国案（[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中，申诉人无法接触证据，因此其代理人无法在法官面前辩称这个案子完全是诱捕。因此，本法院认为这违反了第 6 条第 1 款，因为决定披露证据的程序以及诱捕手段违反了对抗式诉讼和平等手段原则的要求，也无法充分保护被告利益。

108. 下面这种情形也被认为侵犯了获得对抗式庭审的权利：申诉人没有在听证会前收到负责撰写报告的法官的报告，然而检察官却收到了报告，这就使得申诉人没有机会对检察官提交的意见进行答辩。（[Reinhardt and Slimane-Kaid v. France](#), §§ 105-106）。

2. 司法判决理由

109. 已有的判例法体现了一条原则，即正当的司法行政，法院和审判庭的判决应当充分说明其所依据的理由（[Papon v. France](#)（dec.））。

110. 具备充分理由的判决说明法院和审判庭听取了各方意见，因此更容易被接受。另外，这促使法官依据客观论据做出推论，也保护了辩方的权利。然而，判决的性质和客观情况不同，要求提供理由的程度也有所不同（[Ruiz Torija v. Spain](#)，§ 29）。

111. 尽管法院没有义务对每一个主张都给出详细的回答（[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61），但案件关键的争议点必须解释清楚（见 [Boldea v. Romania](#)，§ 30）。

112. 国内法院应该解释清楚判决的依据，以便当事人充分行使申诉权（[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and [Boldea v. Romania](#)）。

ii. 陪审团判决理由

113.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很少详细论述判决的理由，但在很多案件中，是否详细论述判决理由与是否公正有关。这其中的相关性首先由欧盟委员会认定，之后由本法院判定。

114. 公约不要求陪审员为判决提供理由，根据第 6 条，即使陪审团没有给出判决理由，也不能排除由陪审团审判（[Saric v. Denmark](#)（dec.））。不过，为了符合公正审判的要求，被告和公众必须能够理解判决，这是防止任意裁判的重要措施（[Taxquet v. Belgium](#)[GC]，§ 92；[Legillon v. France](#)，§ 53）。

115. 当巡回法庭与陪审团审判时，必须允许程序上的特别要求，因为陪审员不被要求或是不被允许解释他们个人的观点。在这些情况下，第 6 条要求审查保护措施是否足以防止任意专断并且帮助被告理解定罪理由。这些程序上的保护措施包括主审法官向陪审员提供关于法律问题的指令或指导，或者法官向陪审团展示证据和提出明确疑问，这些形成了判决的框架，也抵消了陪审团判决未说明理由所带来的影响（见 [R. v. Belgium](#)（dec.），[Zarouali v. Belgium](#)（dec.），[Planka v. Austria](#)（dec.）；[Papon v. France](#)（dec.））。当巡回法庭拒绝对每一个被告就不断恶化的情况提出不同的问题时，陪审团就无法对每一个被告的个人刑事责任进行判决，本法院认为这违反了第 6 条第 1 款（[Goktepe v. Belgium](#)，§ 28）。

116. 在贝勒林·拉加尔诉西班牙案（[Bellerín Lagares v. Spain](#)（dec.））中，根据判决所附的陪审团讨论记录，本法院发现受质疑的判决包括了一系列陪审团判定申诉人有罪的事实依据，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以及为了量刑的目的而提及目前的情况，都会影响本案申诉人承担责任的程度。因此，本法院认为有充分理由判断该判决符合第 6 条第 1 款的要求。

117. 任何上诉渠道都必须向被告开放（[Taxquet v. Belgium](#)[GC]，§ 92）。在该案中，只有四个问题和申诉人有关，而这四个问题与询问其他共同被告的措词相同，使他无法确定自己被定罪的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于是申诉人无法理解为何被判有罪，这就属于不公正的审判（§ 100）。

118. 在贾奇诉英国案（[Judge v. the United Kingdom](#)（dec.））中，本法院认为，虽然苏格兰陪审团的判决未说明理由，但该判决的基本框架足以使被告理解自己为何被定罪。另外，苏格兰法律规定的上诉权也足以纠正陪审团的任何不恰当判决。在可适用的上诉法律中，上诉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审查并撤销因审判不公导致的定罪。

2. 保持沉默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a. 确认以及适用范围

119. 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都有保持沉默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Funke v. France](#)，§ 44；[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45；[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60）。尽管第 6 条没有特别提及，但保持沉默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国际公认的，也是第 6 款正当程序概念的核心。上述豁免权保护被告免受当局不合理的压迫，也有助于防止错判，维护第 6 条的目标（[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45）。

120. 从各类最简单的刑事诉讼到最复杂的刑事诉讼，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始终贯穿其中（[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74）。

121. 从被警方询问开始，被告即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45）。

b. 范围

122. 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意味着刑事案件的控方在设法证明其指控内容时，不得通过强迫或压制被告违背其个人意愿的手段来获得证据（[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68；[Bykov v. Russia](#)[GC]，§ 92）。

123. 然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不适用于下列情况：尽管物证是通过强制力从被告处获得，但其存在独立于嫌疑人的意愿，例如依据搜查证获取的文件、呼吸、血尿样本，以及为进行 DNA 鉴定而获得的体表组织（[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69；[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47）。

124. 能否尽快获得律师帮助，是本法院在审查某程序中是否存在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时特别关注的一点。为了保证第 6 条第 1 款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实用并且有效”，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警方询问时就应当有权获得律师帮助，这应当作为一项规则，除非证明在某个案子的特别情形下有不可抗拒的理由限制该权利（[Salduz v. Turkey](#)[GC]，§§ 54-55）。

125. 被警方拘留的人享有不自证其罪、保持沉默以及在被质询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些权利彼此独立：放弃其中一项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余权利。不过，这些权利是相补的，因为被警方拘留的人如果没有事先被告知保持沉默的权利，就更应该获得律师帮助了（[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74；[Brusco v. France](#)，§ 54）。告知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的重要性在于，即使已经被告知他的陈述可能会作为不利证据，嫌疑人仍然有可能愿意向警方做出陈述，但如果嫌疑人没有被明确告知自己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他的决定是在没有法律顾问的情况下做出的，

那么就不能认为嫌疑人的选择是在被充分告知权利的前提下做出的（[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 74;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 54）。

126. 保持沉默并且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嫌疑人在受到警方询问时有选择说或不说的自由。在下面这一案件中，这种自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嫌疑人在被质询时选择保持沉默，当局采用诡计诱出嫌疑人的供词或者其他使其入罪的表述，这类供述是无法通过质询获得的（在这个案件中，嫌疑人向同一个牢房的卧底犯人坦白），或者该口供是在审判的物证环节获得（[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50）。

127. 相反，在贝科夫诉俄罗斯案（[Bykov v. Russia](#)[GC]）中，申诉人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胁迫，也没有被拘留，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去见卧底犯人。而且，该对话记录在审判时未被用作判定有罪的核心，在国内法院审查的大量复杂证据中只起了有限的作用（§§ 102-103）。

c. 相对的权利

128. 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7）。

129. 在审查某一程序是否损害了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时，本法院特别关注以下要素：

- 强迫的性质和程度；
- 程序中是否存在任何相关的保护措施；
- 物证如何使用（[Jalloh v. Germany](#)[GC], § 101;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55; [Bykov v. Russia](#)[GC], § 104）。

130. 一方面，不能仅仅因为被告沉默或是拒绝回答问题、拒绝提供证据就对其定罪。另一方面，如果明显需要嫌疑人做出解释，在国内法院衡量控方证据的说服力时，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不能将被告的沉默纳入考量。因此，也不能说刑事程序中被告保持沉默的决定不会有任何影响。

131. 任何从被告的沉默而得的不利推论，判断其是否违反了第 6 条时，需要考虑整个案子的所有情况，特别要关注国内法院在审核证据和胁迫程度时，对这些不利推论的依赖程度（[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47）。

132. 另外，调查中涉及的公共利益和对特定犯罪行为的惩罚也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并且要与通过合法手段收集的不利于被告的证据进行衡量。但是考虑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剥夺申诉人的辩护权（包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合法的，（[Jalloh v. Germany](#)[GC], § 97）。采取强制手段在非司法性调查中获得答案，并在审判中利用该答案指控被告，这种行为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进行正当化（[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 57）。

4. 使用通过非法手段或侵害公约权利而获得的证据

133. 尽管第 6 条保证了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但并没有制定证据准入方面的规则，这主要由各国法律自行制定（[Schenk v. Switzerland](#), §§ 45-46; [Heglas v. the Czech Republic](#), § 84）。

134. 原则上判断某种特定类型的证据（例如以违反国内法的手段获得的证据）是否可用并不属于本法院的职责。但本法院必须判断整个程序（包括获得证据的手段）是否公平，这需要考察被诉的不法行为，在公约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中，则需要考察侵害行为的性质（[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34; [P.G. and J.H. v. the United Kingdom](#), § 76; [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2）。

135. 在判断程序整体是否公平时，必须关注辩方权利是否得到尊重。特别要考察的是，申诉人是否有机会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并反对其适用。另外，也必须考虑证据的质量，必须考虑影响证据获取的所有情节以及这些情节是否会令人对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怀疑。尽管当获得的证据没有其他物证佐证时，未必会产生公平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当证据十分有力、没有不可靠的风险时，对附属支持证据的需要也就相应减少（[Bykov v. Russia](#)[GC], § 89; [Jalloh v. Germany](#)[GC], § 96）。在这一点上，本法院也特别关注受到质疑的证据对刑事结果是否有决定作用。（[Gäfgen v. Germany](#)）。

136. 在考察违反公约的行为的性质时，要考虑的问题是，以违反《公约》第 8 条所获得的信息作为证据，是否会导致整个审判的不公，与之相反，第 6 条必须考虑案件中所有情节，特别是申诉人的辩护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以及证据的质量和重要性（[Gäfgen v. Germany](#)[GC], § 165）。

137. 然而，在使用违反《公约》第 3 条获得的证据时要特别注意，这些证据都是通过侵犯《公约》所保护的核心且绝对的权利而获取的，即便这些证据对定罪没有决定性作用，但使用这些证据就总是会招致对审判公正性的质疑，（[Jalloh v. Germany](#)[GC], §§ 99 和 105; [Harutyunyan v. Armenia](#), § 63）。

138. 因此，在刑事程序中通过违反《公约》第 3 条而获得的供述，不论是通过酷刑，还是非人道的或有损人格的待遇，都会因为触犯了第 6 条而自动使得整个审判不公（[El Haski v. Belgium](#); [Gäfgen v. Germany](#)[GC], § 166）。这也同样适用于通过酷刑而直接获得的真实证据（[Jalloh v. Germany](#)[GC], § 105; [Gäfgen v. Germany](#)[GC], § 167）。但是，使用通过违反第 3 条、施加不人道但还够不上酷刑的行为获得的证据，只有在会对被告的定罪量刑有影响时，才会认为违反了第 6 条（[El Haski v. Belgium](#), § 85; [Gäfgen v. Germany](#)[GC], § 178）。

139.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受害者作为被告的情况，也适用于涉及第三方的情况（[El Haski v. Belgium](#), § 85）。特别是本法院认为使用通过酷刑获得的证据等同于公然的司法不公，即使该酷刑针对的是第三方（[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63 and 267）。

5. 诱捕

a. 一般规定

140. 本法院注意到有关部门需要使用特殊的调查手段，特别涉及有组织的犯罪和贪污腐败案件。在这一点上，本法院认为使用特殊调查手段，特别是秘密技术，本身并不损害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不过为了防止这些技术所带来的警方教唆的风险，必须对这些手段的使用加以明确的限制（[Ramanaukas v. Lithuania](#)[GC], § 51）。

141. 尽管有组织犯罪的不断增加促使国家采取合理的手段，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司法的要求也是从中推断而来）依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刑事犯罪——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在民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能为了方便调查而牺牲这一权利（*ibid.*，§ 53）。在这一点上，本法院强调警方可以秘密行动但不能引诱（[Khudobin v. Russia](#)，§ 128）。

142. 此外，尽管在初步调查阶段或者犯罪性质所允许的情况下，公约并不反对匿名情报的使用，但审判法院接下来使用这类消息定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35）。只有具备了适当且充分的防止滥用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具备了清楚、可预见的程序用来批准、执行、监管相应的调查手段时，才可以允许使用匿名情报（[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51）。本法院也考虑到，当局在进行秘密行动时，尽管司法监督可能是最合适的，但是如果具备了恰当的程序和保护措施，也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比如检察官的监督（[Bannikova v. Russia](#)，§ 50）。

143. 尽管使用有明确限制和防护措施的卧底也是允许的，但公共利益不能成为使用警方诱捕所获证据的合法性借口，这会使得被告可能在一开始就被剥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54）。

144. 因此，在涉及到使用卧底的案件中，为了确认是否侵犯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本法院第一步要考察是否存在诱捕（“教唆的实质检验”），如果存在，接下来要考察申诉人是否能够在国内法院针对诱捕进行抗辩（[Bannikova v. Russia](#)，§§ 37 和 51）。不论卧底是国家雇佣的还是协助国家机关的私人雇佣的，如果他的行为构成了诱捕，并且由此获得的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用于指控当事人，本法院就会认为这违反了《公约》第 6 条第 1 款（[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73）。

b. 教唆的实质检验

145. 本法院定义的诱捕不同于合法的卧底调查，是指涉及到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安全部门的成员还是依照其指令行事的人员）并没有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调查犯罪活动，而是对引诱本不会发生的犯罪行为施加了影响，使之可能构成犯罪，并依此提供证据进行起诉（[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55）。

146. 在确认调查是否是“被动”时，本法院会审查当局进行秘密行动的理由。特别是审查是否有客观理由怀疑申诉人参与了犯罪活动或有可能实施犯罪（[Bannikova v. Russia](#)，§ 38）。

147. 在审查中，本法院会考察许多因素。例如，在较早的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特谢拉·德·卡斯特罗诉葡萄牙案（[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37-38）中，除了别的因素以外，本法院还考察了申诉人没有犯罪记录、此前没有受到过调查、警方对他一无所知、在他的家里没有找到毒品以及在逮捕过程中搜到的毒品数量不超过卧底所要求的数量等事实。本法院认为该卧底的行为越界了，他们引诱了这起犯罪，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没有警方的参与，这起犯罪也会发生。（§§ 37-38）。

148. 之前的犯罪记录并不表明罪犯更有可能犯罪（[Constantin and Stoian v. Romania](#)，§ 55）。但是如果申诉人熟知当下毒品的价格，并且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毒品，尽管有很多机会退出毒品

交易但他未能退出，这些都会使本法院考察其先前的犯罪活动和意图（[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dec.））。

149. 另一个需要考察的因素是申诉人是否被强迫实施犯罪。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怀疑申请人参与了刑事犯罪或很有可能犯罪的情况下，联系申诉人（[Burak Hun v. Turkey](#)，§ 44），不顾申诉人最初的拒绝，坚持引诱，反复报价（[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67），提供高于市场价的价格（[Malininas v. Lithuania](#)，§ 37），提起戒毒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博取申诉人的同情（[Vanyan v. Russia](#)，§§ 11 and 49），这些行为被本法院认为是向申诉人施加压力促使其犯罪——无论该卧底是安全部门的成员还是按照其指示工作的个人。

150.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卧底是否被认定为“参与”或是“渗入”而非“发起”刑事犯罪。认定为“参与”或“渗入”的案件中，受质疑的行动没有超出卧底工作的界限。在米利涅内诉立陶宛案（[Milinienė v. Lithuania](#)）中，本法院认为，尽管警方影响了案件，特别是为某个人提供设备来记录对话，并且资助其引诱申诉人，但由于是该个人主动实施犯罪，因此警方的这些行为被认定是“参与”而非“发起”刑事犯罪。认定为“发起”刑事犯罪的案件中，有人向警方投诉称申诉人向警方行贿以获取有利的结果，但必须是在副检察长审查并批准该申诉之后（相类似的，见 [Sequeira v. Portugal](#)（dec.）；[Eurofinacom v. France](#)（dec.））。

151. 审查申请人是否遭受受害时，卧底警察行动的开展和执行方式也是需要考察的因素。缺乏清晰可预见的程序来批准、实施、监督受质疑的调查手段，将会使本法院更倾向于认为受质疑的行为构成诱捕：例如，在特谢拉·德·卡斯特罗诉葡萄牙案（[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38）中，本法院注意到卧底的介入不属于法官监督的官方打击毒品的行动；在拉曼诺斯卡斯诉立陶宛案（[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64）中，本法院认为没有理由或个人动机能够表明卧底接近申诉人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没有向上级报告（§ 64）；在万扬诉俄罗斯案（[Vanyan v. Russia](#)，§§46-47）中，本法院注意到警方的行动由负责机构的一个简单的行政决定授权，并且这项决定包含了很少关于这次行动测试的原因和目的，也没有任何司法机关或独立的监督机构对该行动进行监督。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当局使用的“行动测试”一词在维斯洛夫等人诉俄罗斯案（[Veselov and Others v. Russia](#)）中受到详细审查，本法院认为受到质疑的程序有缺陷，使申诉人遭受了警方的专横行为，损害了刑事程序的正义。本法院还认为，国内法院未能充分审查申诉人遭受诱捕的抗辩，特别是没有审核这次测试行动的理由和警方及线人的行为（§ 127）。

c. 有关诱捕抗辩的司法观点

152. 在有关诱捕的案件中，只有当申诉人在审判中能够以反对或其他手段有效地提出诱捕的控诉时，《公约》第 6 条才能适用。法院认为，仅仅有通常的保护措施（比如平等手段原则或辩方的权利）是不够的（[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69）。对于这类案子，本法院指出，如果被告的主张未必全部属实，那么就应当由控方证明不存在诱捕。

153. 如果申诉人提出了诱捕抗辩，也有确定的表面证据，司法机关必须审查案件事实，采取必要措施调查真相，以确定是否存在诱捕。如果确实存在，司法机关必须依据公约做出判断

([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 70)。仅仅有申诉人对刑事指控的认罪也不能免除法院对诱捕的指控进行审查的职责(。[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 72)。

154. 在这一点上, 本法院审查是否有指控诱捕的表面证据在国内法上构成实质辩护, 或者为排除证据提供理由, 或其它类似结果([Bannikova v. Russia](#), § 54)。尽管面对诱捕抗辩时, 是由国内当局决定何种程序适当, 但是本法院要求受质疑的程序必须是对抗式的、充分的、完整的, 并且在诱捕问题上有确定的答案([Bannikova v. Russia](#), § 57)。而且, 在调查当局不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下, 法院将会尤其关注是否符合对抗式程序以及平等手段原则([Bannikova v. Russia](#), § 58)。

155. 当被告坚称自己受引诱而犯罪, 刑事法院必须仔细审查证据, 因为根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公正审判的含义, 所有因为警方诱捕而获得的证据必须排除。当警方行动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保护措施时, 尤其应当如此([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 60)。

156. 如果已有的信息无法使本法院确定申请人是否遭受了诱捕, 关于诱捕抗辩的司法审查就有了决定作用([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46; [Ali v. Romania](#), § 101; 见, [Khudobin v. Russia](#), 国内法院无法通过分析相关的事实和法律要素区分诱捕和合法的调查活动; [V.v. Finland](#), 申请人无法对诱捕提出抗辩; 以及 [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 此案中国内法院对卧底的手段进行了仔细审查, 发现申诉人关于诱捕的主张是没有实质根据的。)

6. 放弃获得公正审判的保障

157. 无论是《公约》第 6 条的字面意思还是其暗含精神, 都没有禁止个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放弃他的自由意志或公正审判的权利。然而, 如果要实现公约的目标, 他必须以明确的方式表示, 并得到相应的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 这样的放弃才是有效的。另外, 也不能与任何重要的公众利益相冲突(见 [Hermi v. Italy](#)[GC], § 73; [Sejdovic v. Italy](#)[GC], § 86)。

158. 只有证明被告能够合理地预见他行为的后果, 他才可以通过其行为以默示的方式放弃《公约》第 6 条所规定的重要权利([Hermi v. Italy](#)[GC], § 74; [Sejdovic v. Italy](#)[GC], § 87)。

B. 公开审讯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 任何人有权……受到……审判机构的……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 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 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 或者是法院认为, 在特殊情况下, 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 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1.公开性原则

159. 审讯程序的公开特征保护当事人在没有公开审查的情况下免受司法机关的暗箱操作；这也是维持法院公信力的方式之一。司法运作的可见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实现《公约》第 6 条第 1 款的目标，即公正审判，保障审判的公正也是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Sutter v. Switzerland](#), § 26; [Riepan v. Austria](#), § 27; [Krestovskiy v. Russia](#), § 24）。

160. 法院程序的公开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举行公开审讯以及公开宣布判决（[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 93; [Sutter v. Switzerland](#), § 27）。

2.获得口头审讯以及出席审判的权利

161. 第 6 条第 1 款“公开审讯”的权利必然意味着获得“口头审讯”的权利（[Döry v. Sweden](#), § 37）。

162. 在刑事案件中，口头公开审讯的原则尤为重要，当某人受到刑事指控时，他必须能够在一审中出席审讯（[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 94; [Jussila v. Finland](#) [GC], § 40）。

163. 很难想像受指控的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如何行使第 6 条第 3 款 c、d、e 项列举的权利，即“为自己辩护”，“询问证人”和“如果不懂或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翻译”的权利。因此，保护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在法院出席的权利是第 6 条最关键的要求之一（[Hermi v. Italy](#) [GC], §§ 58-59; [Sejdovic v. Italy](#) [GC], §§ 81 and 84）。

164. 尽管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开展的审讯本身不违背《公约》第 6 条，但如果某人在缺席时被定罪，之后也不能请求法院重新审查指控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其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或者试图逃脱审判，那么就可以认为存在司法不公（[Sejdovic v. Italy](#) [GC], § 82）。

165. 进行审讯的义务并非在所有案件中都绝对属于第 6 条的刑事部分。根据更宽泛的关于“刑事指控”的定义，对于那些传统上不属于刑法范畴的案件（例如行政处罚、海关法和税收滞纳金）有不同的考量。公平审讯的要求是刑法核心中最严格的，第 6 条对于刑法方面的保障并不一定适用于上述其他类型的案件，也没有任何程度上的特征（[Jussila v. Finland](#) [GC], §§ 41-43）。

166. 合法取消口头审讯情形的特征与管辖法院处理案件的性质有关，特别是那些基于案件文件资料无法充分解决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问题。当对事实没有争议、对可靠性没有质疑时，不需要口头展示证据、交叉询问证人，或被告有充分的机会以书面方式提出控告并质疑对其不利的证据，此时口头审讯并不是必须的（[Jussila v. Finland](#) [GC], §§ 41-42, 47-48）。在这一点上，国内法院考虑到效率和经济上的要求取消口头审讯是合法的（[Jussila v. Finland](#) [GC], §§ 41-43, 47-48, 有关税收滞纳金诉讼; [Suhadolc v. Slovenia](#) (dec.)，有关道路交通违法的简易程序）。

3. 申诉程序

167. 和初审不同，被告在申诉审讯中是否出席并不那么重要。在上诉法院期间第 6 条的运用取决于所涉程序的特征，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内法律秩序整个程序和之后上诉法院所起的作用（[Hermi v. Italy](#)[GC], § 60）。

168. 和对事实的质疑不同，如果一审已经进行了公开审讯，即使申诉人不能亲自由上诉法院审问，上诉许可程序和对法律质疑的程序也有可能符合第 6 条的要求。（[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 关于上诉许可, [Sutter v. Switzerland](#), § 30, 关于上诉法院）。

169. 即使上诉法院有权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重审案件，第 6 条也并不总是要求公开审讯，更不必说要求亲自出席（[Fejde v. Sweden](#), § 31）。为了确定这个问题，必须关注程序的特征以及在上诉程序中对申诉人利益的保护方式，特别是要考虑待确定的争议点的性质（[Seliwiak v. Poland](#), § 54; [Sibgatullin v. Russia](#), § 36）。

170. 然而，当上诉法院必须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审查案件，并对有罪与否做出全面的审查时，如果没有直接审查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犯所控罪名而亲自提交的证据，那么上诉法院就不能做出有罪与否的判决（[Popovici v. Moldova](#), § 68; [Lacadena Calero v. Spain](#), § 38）。审讯应当公开的原则包含了被告亲自向上诉法院提交证据的权利。从这方面看，公开原则有利于实现保护被告辩护权利的目标（[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 95）。

4. 公开性原则的例外

171. 举行公开审讯原则有例外。从第 6 条第 1 款的字面含义来看，它包含了以下条款“……出于对未成年人利益或当事人私生活的保护，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法院认为公开审讯会损害公正利益，则可以拒绝媒体和公众旁听全部或部分审讯。”不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审讯，上述情形必须严格适用非公开形式（[Welke and Białek v. Poland](#), § 74; [Martinie v. France](#) [GC], § 40）。

172. 如果有理由适用其中一种或多种例外情形，当局认为此种限制是有正当理由的，那么就有权（而非义务）命令审讯以非公开形式进行。（[Toeva v. Bulgaria](#)（dec.））。

173. 尽管刑事程序要求高度公开性，第 6 条有时也限制程序的公开，例如，为了保护证人的安全或隐私，或是为了追求正义而促进信息观点的自由交换（[B. and P.v. the United Kingdom](#), § 37）。

174. 安全问题是许多刑事案件的共同特点，但是仅仅基于安全问题就能合法地排除公众旁听审判的案件仍然是很少见的（[Riepan v. Austria](#), § 34）。安全措施应当谨慎地适用并符合必要性原则。司法机关应该考虑所有可能的替代手段来保证法庭的安全，当能达到同样目的时，优先适用最不苛刻的手段（[Krestovskiy v. Russia](#), § 29）。

175. 出于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考虑，可以在对已定罪的犯人的监狱纪律处分程序中不适用公开性原则（[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87）。

176. 在监狱举行一场普通刑事程序的审判并不一定意味着审判是非公开的。然而，为了应对不在常规的法庭审理所面对的障碍，国家有义务采取补偿措施以保证公众和媒体按时获知审讯的地点并能有效进入（[Riepan v. Austria](#), §§ 28-29）。

177. 在没有衡量公开性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案件档案中存在保密材料并不自动暗示着审判必须对公众保密。在拒绝公众旁听刑事程序之前，法院必须确认不公开对于保护必要的国家利益是必须的，而且保密的程度必须限制在保护此种利益的范围内（[Belashev v. Russia](#), § 83; [Welke and Białek v. Poland](#), § 77）。

5. 判决的公开宣布

178. 本法院没有局限于采用“公开宣布”的文义解释（[Sutter v. Switzerland](#), § 33;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1）。

179. 除了该条字面含义所要求的在法庭上公开宣读的方式，其他公开宣布判决的方式也符合第 6 条第 1 款。通常，作为应诉国，其国内法律关于公开判决的形式必须依据程序特征并参考第 6 条第 1 款追求的目标进行审查，也就是为了保护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保证对司法程序的审查。在审查时，必须考虑整个诉讼程序（[Welke and Białek v. Poland](#), § 83，此案中对判决的执行部分采用非公开形式并没有违反第 6 条）。

180. 完全向公众隐瞒判决是不合理的。可以采用某些手段解决关于安全的担忧，例如仅对披露后会损害国家安全或其他人安全的判决内容进行保密（[Raza v. Bulgaria](#), § 53; [Fazliyski v. Bulgaria](#), §§ 67-68）。

C. 合理的时间

第 6 条第 1 款

“1. 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讯。”

1. 诉讼程序期间的终止

181. 刑事案件中，第 6 条第 1 款规定任何人都无权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目标是保证被告无需因指控持续时间过长而撒谎，并保证对指控做出明确判决，（[Wemhoff v. Germany](#), § 18; [Kart v. Turkey](#)[GC], § 68）。

a. 期间的起始时间

182. 期间自被告人受指控之日起算（[Neumeister v. Austria](#), § 18）。

183. “合理时间”可能开始于案件提交审判法院之前，（[Deweert v. Belgium](#), § 42），比如自逮捕之日起（[Wemhoff v. Germany](#), § 19）、自提出指控之日起（[Neumeister v. Austria](#), § 18）或者初步调查之日起（[Ringeisen v. Austria](#), § 110）。

184. 根据第 6 条第 1 款的目标，“指控”应该被定义成“当局对于某人就其犯下的刑事违法行为而给予的官方通告”（[Deweert v. Belgium](#), § 46），该定义也与考察嫌疑人的处境是否被

“实质影响”相呼应（[Deweert v. Belgium](#), § 46; [Neumeister v. Austria](#), § 13; [Eckle v. Germany](#), § 73; [McFarlane v. Ireland](#)[GC], § 143）。

b. 期间的终止

185. 本法院认为第 6 条规定的期间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所有程序（[König v. Germany](#), § 98），包括上诉程序（[Delcourt v. Belgium](#), §§ 25-26; [König v. Germany](#), § 98; [V.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09）。而且，第 6 条第 1 款表明期间终止于对指控做出判决之时，也可以是上诉法院对指控的实质内容做出决定之时（[Neumeister v. Austria](#), § 19）。

186. 期间直至判决无罪或有罪时终止，即使涉及上诉裁判。没有理由认为针对刑事程序延期的保护应当在第一次审判时终止：对无理由的延期或审判法院的过度延期应当产生担忧（[Wemhoff v. Germany](#), § 18）。

187. 如果已经定罪，但只要处刑并非绝对确定，就不存在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确定刑事指控”（[Eckle v. Germany](#), § 77; [Ringeisen v. Austria](#), § 110; [V.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09）。

188. 出于第 6 条的目标，任何法院判决的执行必须被看作是审判的一部分（[Assanidze v. Georgia](#)[GC], § 181）。如果缔约国的国内法律或行政系统允许一个宣告无罪的有约束力的最终的司法判决对宣告无罪的人是无法完成的，《公约》第 6 条提供的保障就会变成泡影。刑事程序是一个整体，第 6 条提供的担保不会随着宣告无罪的判决而停止（*同上*, § 182）。如果国家行政机关拒绝或未能履行或者延迟履行宣告被告无罪的判决，刑事程序中被告享有的第 6 条的保障就是部分形同虚设的（*同上*, § 183）。

2. 合理时间的审查

a. 原则

189. 诉讼程序期间长短的合理性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需要进行全面的审查（[Boddaert v. Belgium](#), § 36）。诉讼程序中的不同阶段需要以合理的速度推进，但是诉讼程序的总期间不能超过“合理的时间”（[Dobbertin v. France](#), § 44）。

190. 第 6 条要求司法程序迅速而有效率，但也制定了更为概括的适当司法行政原则。这项基本要求的不同方面需要保持平衡（[Boddaert v. Belgium](#), § 39）。

b. 标准

191. 在确定刑事程序期间是否合理时，本法院会考虑诸如案件的复杂程度、申请人的行为以及相关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行为等因素（[König v. Germany](#), § 99; [Neumeister v. Austria](#), § 21; [Ringeisen v. Austria](#), § 110;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 [GC], § 67; [Pedersen and Baadsgaard v. Denmark](#), § 45）。

192. 案件的复杂性可能来自于以下因素：控告的数量，案件中涉及的人数比如被告和证人的数量，或者案件的国际化程度（[Neumeister v. Austria](#), § 20:此案中涉及的交易在许多不同国家都

有分支机构，需要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以及履行法律互助协议，涉及 22 个人，其中有些人在国外）。如果案件涉及到“白领”犯罪，也会特别复杂——大面积的诈骗牵涉数个国家，为了逃避调查机构的审查而需要设计复杂交易，并且需要相当程度的会计和金融专业知识（[C.P. and Others v. France](#), § 30）。

193. 即使案件非常复杂，本法院也不能将案件中没有解释的无作为期间视为“合理”（[Adiletta v. Italy](#), § 17: 本案中，审理期限长达十三年零五个月，包括将案件提交给调查法官和质询被告及证人之间延迟的五年，以及将案件返还给调查法官和重新将申诉人收押待审之间延迟的一年零九个月）。

194. 申诉人的行为：第 6 条并不要求申诉人和司法机关积极合作。申诉人也不能因为充分利用国内法提供的救济措施而受惩罚。不过，他们的行为属于客观事实，不能归因于应诉国一方，在判断审讯期间是否合理时也必须纳入考量（[Eckle v. Germany](#), § 82: 本案中申诉人使用越来越多的类似延长诉讼程序的救济措施，比如有计划地要求法官回避；有些行为可以看作是故意的干扰）。

195. 有一种情况是申诉人试图延长调查，这种行为必须纳入考虑范围，这从案件材料上可以明显看出（[I.A. v. France](#), § 121: 本案中的申诉人在要求一系列额外的调查手续之前，等待被告知需要立即将案件材料转交给公诉人）。

196. 申诉人逃避本国法律制裁的时间不能计入合理时间内。如果被告逃避本国依照法律实施的制裁，可以假定他无权控诉诉讼程序的延长，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推翻该假定（[Vayic v. Turkey](#), § 44）。

197. 相关机构的行为：第 6 条第 1 款要求缔约国在构建司法系统时应当设立符合公约标准的法院（[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 24; [Dobbertin v. France](#), § 44）。

198. 如果缔约国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处理例外情形，那么缔约国就无需因暂时积压案件而负责（[Milasi v. Italy](#), § 18; [Baggetta v. Italy](#), § 23），但是本法院很少将机构繁重的工作量以及各种救济措施视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力。（[Eckle v. Germany](#), § 92）。

199. 在审查诉讼期间的合理性时，应当考虑与申诉人利害相关的因素。例如，当某人处于审前羁押时，需要考虑该指控是否会在合理期限内判决（[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 24: 本案持续时间为五十二个月，其中两次要求将文件上交给最高法院的时间总和就超过了二十一个月。本法院认为如此长的无作为期间是不可接受的，特别是此时被告仍处于羁押之中）。

3.几个例子

a. 超过合理期限

- 九年零七个月：不考虑有关部门在暴乱时期处理法院的某些特殊案件所采取的措施，除了涉及人数为 35 人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复杂之处（[Milasi v. Italy](#), §§ 14-20）。
- 十三年零四个月：地区政治动乱，法院工作量过多，多年后国家才开始设法改善法院的工作条件（[Baggetta v. Italy](#), §§ 20-25）。

- 五年零五个月又十八天：其中，从作出判决直到负责法官写出完整的判决历经三十三个月，在此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恰当的惩戒措施（[B. v. Austria](#), §§ 48-55）。
- 五年零十一个月：在这一严重渎职案中，被质询的人数众多，审查文件的技术性强，因此案件比较复杂，但这并不是调查行动持续五年零两个月的正当理由；而且有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作为。因此，尽管审判期限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并没有进行尽职调查（[Rouille v. France](#), § 29）。
- 十二年零七个月又十天：没有复杂情况，被告也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来延长期限，但自行政诉讼提交申请直到税务部门收到最初的请求，之间相隔时间长达两年零九个月（[Clinique Mozart SARL v. France](#), §§ 34-36）。

b. 没有超过合理期限

- 五年零两个月：案件非常复杂，涉及诈骗和破产欺诈，除了要求释放之外，申诉人还提出其它大量的请求和申诉，包括质疑大部分相关法官并请求将该诉讼转移至其它法院审理（[Ringeisen v. Austria](#), § 110）。
- 七年零四个月：提出指控之后过了七年仍然没有对被告做出有罪或无罪判决，这是特别长的一段时间，在大多数案件中被视作超过了合理期限；而且，在其中长达十五个月的时间内，法官没有质询人数众多的共同被告或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也没有履行其他职责；不过，这起案件特别复杂，涉及诸多罪名，牵涉人数众多，涉外因素也造成了请求国外司法协助的困难，因此认为没有超过合理期限（[Neumeister v. Austria](#), § 21）。

V. 具体的保障

A. 第 6 条第 2 款：无罪推定

第 6 条第 2 款

“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明有罪之前，当推定无罪。”

1. 证明责任

200. 无罪推定原则尤其要求法庭成员在履行职责时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被告已犯所控罪行；控方负有证明责任，而且任何疑点都应采取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控方告知被告本案将会对他起诉，以使被告可以相应地准备并辩护，同时控方要提出足以使其定罪的证据（[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 § 77；[Janosevic v. Sweden](#), § 97）。如果将证明责任从控方转移到辩方，

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Telfner v. Austria](#), § 15）。在诉讼程序终止后的赔偿环节，证明责任不能倒置（[Capeau v. Belgium](#), § 25）。

201. 刑事上免责不排除基于相同事实但承担更轻证明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Ringvold v. Norway](#), § 38; [Y v. Norway](#), § 41; [Lundkvist v. Sweden](#) (dec.)）。

2. 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

202.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推定无罪并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因为所有刑事系统都会采用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公约也没有禁止这两种推定方式（[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此案涉及交通违法，涉案车辆登记的车主并非实际驾驶人，但是对其施加了罚款）。在某些情形下，缔约国无需考虑行为人是出于刑事犯罪目的还是出于过失，可以对诸如此类的简单或客观事实施加处罚（[Salabiaku v. France](#), § 27，对于从毒品持有者处走私的，推定承担刑事责任；[Janosevic v. Sweden](#), § 100，基于客观理由，在法院判决前课以税收滞纳金）。不过第 6 条第 2 款要求各国对推定要有合理的限制，应当考虑相关利益的重要性，同时要保证辩方权利（[Salabiaku v. France](#), § 28; [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 24，推定一位在广播节目中进行诽谤的出版主任应承担刑事责任；[Klouvi v. France](#), § 41，根据法律推定，对因缺乏证据而被宣告无罪的被告提起指控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不能对恶意起诉进行辩护）。

203. 在刑法中适用推定时，缔约国要在所涉利益的重要性和辩方权利之间保持平衡；换句话说，为实现立法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必须合乎比例（[Janosevic v. Sweden](#), § 101; [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

3. 第 6 条第 2 款的适用范围

a. 刑事诉讼

204. 第 6 条第 2 款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不论控诉结果如何，也不仅仅适用于案件的实质审查（[Poncelet v. Belgium](#), § 50; [Minelli v. Switzerland](#), § 30; [Garycki v. Poland](#), § 68）。

205. 当一审判决被告有罪，被告提起上诉时，无罪推定原则仍然继续适用（[Konstas v. Greece](#), § 36）。

206. 一旦被告被证明有罪，在量刑环节，第 6 条第 2 款不能适用于有关被告性格和行为的主张，除非此种主张的性质和程度足以构成一项新的“指控”（[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5; [Böhmer v. Germany](#), § 55; [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 43）。

207. 不过无罪推定原则及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属于《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公正审判权利一般概念的部分，在量刑环节仍然适用（[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40; [Grayson and Bar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 37 and 39）。

b. 后续程序

208. 无罪推定原则可以保护被宣告无罪的被告或者继续进行的诉讼中的被告避免被政府官员或机构当做实际有罪而对待。如果没有保护措施来保证对无罪或诉讼终止结果的尊重，第 6 条第 2 款提供的保障将有形同虚设之嫌。一旦刑事程序终结，当事人的名誉以及大众的评价也会受到影响（[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94）。

209. 在后续程序中，关于第 6 条第 2 款能否适用的问题，申请人必须证明已终结的程序和后续程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有可能呈现的，例如：后续程序要求审查之前刑事程序的结果，特别是要求法院分析判决；参与刑事文档中证据的重审和评估；审查申诉人在刑事指控所指向的部分或全部事件中的参与度；评估关于申诉人可能有罪的暗示和迹象（[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04）。

210. 本法院认为，在下列情形中，第 6 条第 2 款可以适用于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做出的司法决定：

- (a) 由被告承担法庭和控方诉讼费用；
- (b) 被告针对还押期间的拘留及刑事诉讼带来的其他不便请求赔偿；
- (c) 被告请求控方承担辩护费用；
- (d) 被告针对调查或控诉中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请求赔偿；
- (e) 承担向受害人赔偿的民事责任；
- (f) 拒绝申诉人针对保险人提起的民事索赔；
- (g) 在控方决定不针对家长虐待儿童进行起诉后，仍然保持照顾儿童命令的效力；
- (h) 处分或开除；
- (i) 撤销申诉人享有保障性住房的权利（见 [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98，之后被大量的案件引用）。

4. 不利声明

211. 第 6 条第 2 款旨在防止和诉讼有关的不利声明损害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当这样的诉讼根本不存在或尚未存在时，导致刑事或其他应受谴责行为的声明会引起《公约》第 6 条和第 8 条所规定权利的有关争议，这类声明与针对诽谤的保护措施以及基于民事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密切相关（[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 160）。

212. 一份仅仅是怀疑某人犯罪的声明和一份在没有最终定罪的情况下明确宣称某人犯罪的声明之间有根本的区别（[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 166；， § 89）。后者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而前者在多种情况下被本法院视作是不客观的（[Garycki v. Poland](#), § 67）。

213. 在判断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做出的声明是否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时，必须考虑作出该抨击声明时的具体情况（[Daktaras v. Lithuania](#), § 42；[A.L. v. Germany](#), § 31）。

214. 比起其他调查机关，法官作出的声明要接受更严格的审查（[Pandy v. Belgium](#), § 43）。

215. 只要刑事诉讼的结果并未对指控实质内容下定论，那么表达对被告的怀疑就是可以接受的（[Sekanina v. Austria](#), § 30）。然而，一旦最终决定是判定无罪，任何怀疑有罪的表达就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Rushiti v. Austria](#), § 31；[O. v. Norway](#), § 39；[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 49；[Paraponiaris v. Greece](#), § 32）。

5. 司法机关的声明

216. 如果司法决定在依法证明某人有罪之前就显示其有罪，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正式的证据，但只要理由说明法院将被告当作有罪对待就足够（[Minelli v. Switzerland](#), § 37；[Nerattini v. Greece](#), § 23；[Didu v. Romania](#), § 41）。法庭表达如此不成熟的观点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与无罪推定相冲突（[Nešťák v. Slovakia](#), § 88；[Garycki v. Poland](#), § 66）。

217. 在适用第 6 条第 2 款时，重要的是声明的真实内容而非字面形式（[Lavents v. Latvia](#), § 126）。

218. 即使申诉人最终被定罪，这也不能剥夺他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被推定无罪的权利。（[Matijašević v. Serbia](#), § 49；[Nešťák v. Slovakia](#), § 90，有关延长申请人在押候审期限的决定）。

6. 政府官员的声明

219. 除了法官或法院，其他政府官员也有可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 36；[Daktaras v. Lithuania](#), § 42；[Petyo Petkov v. Bulgaria](#), § 91）。第 6 条第 2 款禁止政府官员在刑事调查尚在进行时发布声明引导大众认为被告有罪，影响司法机关的审查（[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 161；[Butkevicius v. Lithuania](#), § 53）。

220. 无罪推定原则并不禁止当局向公众告知刑事程序的进展，但必须在尊重无罪推定的基础上谨慎告知（[Fatullayev v. Azerbaijan](#), § 159；[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 38；[Garycki v. Poland](#), § 69）。

221.， 本法院强调，政府官员在某人被判定有罪之前做出声明时应当谨慎措辞（[Daktaras v. Lithuania](#), § 41；[Arrigo and Vella v. Malta](#) (dec.)；， § 94）。

7. 负面新闻活动

222. 在民主社会中，媒体针对有关公共利益案件进行激烈讨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Viorel Burzo v. Romania](#), § 160；[Akay v. Turkey](#) (dec.)）。

223. 然而，恶意的新闻活动会影响公众舆论，从而影响负责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陪审员，因此不利于审判的公正性（[Kuzmin v. Russia](#), § 62）。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审判法院在主观上对嫌疑人没有偏见，而是在案件的特定情形下，嫌疑人的恐惧可以被认为是客观合理的（[Włoch v. Poland](#) (dec.)，[Daktaras v. Lithuania](#) (dec.)，[Priebke v. Italy](#) (dec.)； 以及

[Mustafa Kamal Mustafa \(Abu Hamza\) \(no.1\)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 37-40, 有关媒体报道对审判法院的公正性的影响)。

224. 不同于陪审团的成员，国内法院由职业法官组成，他们通常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接受了足够的训练，很难受外界影响 ([Craxi v. Italy \(no. 1\)](#), § 104)；[Mircea v. Romania](#), § 75)。

225. 发布嫌疑人的照片本身并不违反无罪推定 ([Y.B. and Others v. Turkey](#), § 47)。在某些情况下，在电视上发布嫌疑人的照片可能会引起与第 6 条第 2 款规定有关的争议 ([Rupa v. Romania \(no. 1\)](#), § 232)。

8. 对于不提供信息的行为的制裁

226. 无罪推定原则和不得自证其罪紧密相连 ([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 40)。

227. 要求车主辨认出交通违法行为发生时的实际驾驶员，这不符合《公约》第 6 条的规定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228. 要求驾驶员进行呼吸测试或血液检测并不违反无罪推定 ([Tirado Ortiz and Lozano Martin v. Spain](#) (dec.))。

B. 第 6 条第 3 款：辩方的权利

第 6 条第 3 款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a) 以他所了解的言立即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b) 当有适当的和便利条件作准；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的律师助替自己，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助用的，基于公平利益的考，当免除他的有关用；

(d) 不利他的，并在与不利他的具有相同的条件下，有利于他的出庭接受；

(e) 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言，可以求免的助翻。”

229. 第 6 条第 3 款关于辩方权利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公约》第 6 条第 1 款保障的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特别方面 ([Sakhnovskiy v. Russia](#)[GC], § 94；[Gäfgen v. Germany](#)[GC], § 169)。

230. 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的具体保障措施针对刑事案件中的典型程序情形，举例说明了公平审判的概念，但这些措施的本质目标是保证或是有助于保证刑事诉讼整体的公平。因此，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的保护措施并不仅限于其本身的含义，必须针对相关程序的具体情形解释其相应的作用 ([Mayzit v. Russia](#), § 77；[Can v. Austria](#), § 48)。

1. 第 6 条第 3 款 a 项：有关指控性质和原因的信息

第 6 条第 3 款 a 项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a) 以他所了解的言立即地通知他被指控罪名的性质以及被指控的原因；”

a. 一般规定

231. 必须依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对第 6 条第 3 款的适用范围进行审查。在刑事案件中，提供全面详细的指控信息使得法院能够采用该法律表述，是保证诉讼公正的必要前提（[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52; [Sejdovic v. Italy](#)[GC], § 90）。

232. 第 6 条第 3 款的 a 项与 b 项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在审查被告知指控信息的权利时，必须结合被告所享有的准备辩护的权利来考察（[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54; ， § 47）。

b. 有关指控的信息

233. 第 6 条第 3 款 a 项指出需要特别注意通知被告其被起诉。犯罪事实在刑事程序中起关键作用，因为正是在收到书面通知时，嫌疑人被告知其所受指控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Kamasinski v. Austria](#), § 79;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51）。

234. 第 6 条第 3 款 a 项赋予被告的权利不仅包括得知指控的“原因”（即指控所依据的他实施的犯罪行为），也包括罪名的“性质”（即对这些行为的法律表述）（[Mattoccia v. Italy](#), § 59; [Penev v. Bulgaria](#), §§ 33 和 42, 2010）。

235. 这些信息不一定需要提及指控依据的证据（[X.v. Belgium](#)（dec.）; [Collozza and Rubinat v. Italy](#)）。

236. 第 6 条第 3 款 a 项对通知被告所指控罪名的性质和原因没有特殊的形式上的要求（[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53; [Drassich v. Italy](#), § 34; [Giosakis v. Greece](#)（no. 3）, § 29）。

237. 控方应当承担通知被指控者的义务，并且不能只是消极地公开消息而不以引起辩方注意的方式通知（[Mattoccia v. Italy](#), § 65; [Chichlian and Ekindjian v. France](#), § 71）。

238. 被指控者必须确实收到了指控信息；仅仅有法律推定的接收是不够的（[C.v. Italy](#)（dec.））。

239. 如果被申诉的情形是被指控者自身行为造成的，那么被指控者没有资格主张其辩护权利受到侵犯（[Erdogan v. Turkey](#)（dec.）;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6）。

240. 被指控者患有精神疾病，当局被要求采取额外措施使其能够得知被指控罪名的性质和原因（[Vaudelle v. France](#), § 65）

c. 指控的重新归类

241. 被指控者必须能够及时充分得知被指控的罪名及原因的任何变化，而且必须有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予以回应，并基于新的信息或主张准备辩护（[Mattoccia v. Italy](#), § 61;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242. 有关指控的信息（包括法院可能会适用的法律定性）必须在审判前的起诉书中提交，或者至少在审判过程中通过其他诸如正式的或暗示的指控延伸方式提出。仅仅提及法院可能就犯罪成立条件得出与控方不一样的结论是明显不够的（[I.H. and Others v. Austria](#), § 34）。

243. 在诉讼程序中对事实进行重新归类时，必须保证被指控者能够及时有效地行使辩护权（[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62; [Block v. Hungary](#), § 24）。

244. 如果罪名的重新归类涉及到指控的某一本质要素，那么对被告而言就是可以充分预见的（[De Salvador Torres v. Spain](#), § 33;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1\)](#), §§ 52 和 56;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 32）。

245. 如果被告有机会就新指控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并依据所有相关的法律和事实进行辩护，那么指控罪名通知的缺陷就可以在上诉阶段得以修正（[Dallos v. Hungary](#), §§ 49-52; [Sipavičius v. Lithuania](#), §§ 30-33; [Zhupnik v. Ukraine](#), §§ 39-43; , §§ 36-38;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 33）。

d. “详细”

246. 尽管信息的“详细”程度依据案件不同情况而定，但被指控者至少要有足够的信息充分理解对其指控的罪名，以准备恰当的辩护。

247. 必须依据第 6 条第 3 款 b 项以及第 6 条第 1 款，考察信息的充分程度（第 6 条第 3 款 b 项规定给予被指控者适当的时间和便利条件准备辩护，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是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Mattoccia v. Italy](#), § 60;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e. “及时”

248. 信息必须及时传递给被告供其准备辩护，这也是第 6 条第 3 款 a 项的目的暗含的原则（[C.v. Italy](#) (dec.)，此案中，本法院认为在审判前四个月通知申诉人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在博里索瓦诉保加利亚案（[Borisova v. Bulgaria](#), §§ 43-45）中，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申诉人只有几个小时准备辩护）。

249. 在审查是否符合第 6 条第 3 款 a 项时，本法院会考虑“被指控”以及“刑事指控”的含义，并依据客观内容而非形式方面进行解释（[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Casse v. Luxembourg](#), § 71）。

f. “语言”

250. 如果有理由相信被告对所提供信息使用的语言不了解，当局必须为他提供翻译（[Brozicek v. Italy](#), § 41; [Tabai v. France](#) (dec.)）。

251. 尽管第 6 条第 3 款 a 项没有具体要求相关信息必须以书面形式或是翻译成书面形式提供给外国被告人，但如果被告没有获得以他所能理解的语言翻译的书面起诉书，而他又不熟悉法院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实际会处于不利位置（[Hermi v. Italy](#)[GC], § 68; [Kamasinski v. Austria](#), § 79）。

252. 但是如果被告能够准备辩护，那么关于指控的详细信息也可以通过口头翻译起诉书的方式提供（[Kamasinski v. Austria](#), § 81; [Husain v. Italy](#) (dec.)）。

253. 本条款没有规定被告获得法院所有文件翻译的权利（[X.v. Austria](#), Commission decision）。

254. 依据第 6 条第 3 款 e 项规定的获得免费翻译的权利，指控的翻译费用由国家承担（[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5）。

2. 第 6 条第 3 款 b 项：准备辩护

第 6 条第 2 款 b 项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b) 当有适当的 和便利条件 作准 ;”

a. 一般性考虑因素

255. 《公约》第 6 条第 3 款 b 项规定了恰当辩护的两个要素，即便利条件和时间。该条款意味着被告的实质辩护活动包含了任何对准备审判而言“必要”的要件。被告必须有机会以恰当的方式准备辩护，不受任何影响其在审判中提交辩护依据从而影响诉讼结果的限制（[Can v. Austria](#), § 53; [Gregačević v. Croatia](#), § 51）。

256. 被告获得的适当时间和便利条件依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而定（[Iglin v. Ukraine](#), § 65; [Galstyan v. Armenia](#), § 84）。

b. 适当的时间

257. 《公约》第 6 条第 3 款 b 项保护被告不受轻率的审判；（[Kröcher and Möller v. Switzerland](#) (dec.); [Bonzi v. Switzerland](#) (dec.)）。尽管诉讼应及时进行，但不能以牺牲某方的程序权利为代价（[O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 540）。

258. 在审查被告是否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辩护时，要特别关注诉讼的性质，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进展阶段（[Gregačević v. Croatia](#), § 51）。此外，也要考虑律师的通常工作负担；然而，如果案件有特殊紧急情况，要求辩护律师改变工作重点也是合理的（[Mattick v. Germany](#) (dec.)）。

259. 《公约》第 6 条第 3 款 b 项不要求审判的准备在第一次听证前完成。审判过程不可能全部提前计划，可能会显现出之前没有预见的要素，需要各方进一步准备（[Mattick v. Germany](#) (dec.)）。

260. 诉讼过程中发生特定情形时，必须给予辩方额外的时间调整定位、准备请求、提起上诉（[Miminoshvili v. Russia](#), § 141）。这类“情形”包括起诉书的变更（[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 62），控方提出新证据（[G.B.v. France](#), §§ 60-62），或者审判中专家意见突然发生重大改变（[G.B.v. France](#), §§ 69-70）。

261. 如果发现与时间相关的问题，被告有望请求审讯休庭或延期（[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8；[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Craxi v. Italy \(no. 1\)](#), § 72），除非有特殊情形（[Goddi v. Italy](#), § 31）或者国内法律及实践中没有这类权利的依据（[Galstyan v. Armenia](#), § 85）。

262. 在特定情形下，法院可以主动决定休庭，以给予辩方充足的时间准备（[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 57；[Sakhnovskiy v. Russia](#)[GC], §§ 103 和 106）。

263. 为了使被告能够充分行使上诉权，国内法院必须明确指出判决的依据（[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 33）。如果在上诉期间届满前无法做出论理充分的判决，就必须给予被告足够的信息以便其能够上诉（[Zoon v. the Netherlands](#), §§ 40-50；[Baucher v. France](#), §§ 46-51）。

264. 国家必须保证每一个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得到第 6 条第 3 款的保障。要求上诉人证明已确定的期间何时开始或届满，这和“尽职”一词含义不符——缔约国必须做到“尽职”来保证《公约》第 6 条的权利得以有效行使（[Vacher v. France](#), § 28）。

c. 适当的便利条件

i. 获取证据

265. 任何受刑事指控的人都应该获得的便利条件包括了解调查结果以便准备辩护的机会（[Huseyn and Others v. Azerbaijan](#), § 175；[O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 538）。

266. 当某人被拘留候审时，“便利条件”包括能够专心阅读和书写的环境（[Mayzit v. Russia](#), § 81；[Moiseyev v. Russia](#), § 221）。保证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能够参与诉讼并提交意见而无需受疲惫之苦也非常重要（[Makhfi v. France](#), § 40；[Barberà, Messegué and Jabardo v. Spain](#), § 70）。

267. 被告应享有的便利条件仅限于在准备辩护过程中帮助或可能帮助被告的条件（[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Mayzit v. Russia](#), § 79）。

268. 无须保证被告直接获取案件材料，由他的代理人告知就足够了（[Kremzow v. Austria](#), § 52）。然而，被告获取案件材料权利的有限性并不能阻止被告在审判前获得证据，被告也有机会通过律师的口头意见发表评论（[GC], § 140）。

269. 当被告被允许自行辩护，否认其获取案件材料的权利等同于侵犯其辩护权（[Foucher v. France](#), §§ 33-36）。

270. 为了便于辩护，被告可以获得相关案件材料的复印件，并汇编使用其笔记（[Rasmussen v. Poland](#), §§ 48-49；[Moiseyev v. Russia](#), §§ 213-218；[Matyjek v. Poland](#), § 59；[Seleznov v. Russia](#), §§ 64-69）。

271. 获取案件材料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案件中，为了保护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是为了维护如国家安全之类的公共利益，或是出于保护证人的需要，或是为了保障警方的犯罪调查手段，有必要将某些证据排除在被告可获取的范围之外。然而，只有这些限制辩方权利的十分必要的措施才是第 6 条第 1 款所允许的。本法院将会严格审查决策程序以保证其符合对抗制诉讼、平等手段原则的要求，并保证其保护被告利益的手段是恰当的（[Natunen v. Finland](#), §§ 40-41; , §§ 42-43; [Mirilashvili v. Russia](#), §§ 203-209）。

272. 不向辩方出示可能使其脱罪或减刑的证据，这可能会被认为是拒绝为被告准备辩护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因此侵犯了《公约》第 6 条第 3 款 b 项所保障的权利。不过，被告应该给出请求的详细理由，而且国内法院有权审查这些理由的效力（[Natunen v. Finland](#), § 43; [C.G.P.v. the Netherlands](#) (dec.)）。

ii. 向律师咨询

273. 向被告提供的“便利条件”包括向律师咨询（[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9; [Goddi v. Italy](#), § 31）。咨询辩护律师的机会对于被告准备辩护来说至关重要（[Bonzi v. Switzerland](#) (dec.) ; [Can v. Austria](#), § 52）。

274. 第 6 条第 3 款 b 项和第 6 条第 3 款 c 项都规定了获取法律协助的权利（见，例如 [Lanz v. Austria](#), §§ 50-53 ; [Öcalan v. Turkey](#)[GC], § 148 ; [Trepashkin v. Russia \(no. 2\)](#), §§ 159-168）。

3.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本人亲自辩护或者获取法律协助的权利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c) 由他本人或者由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替自己辩护，或者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的，基于公平利益的考虑，应当免除他的有关费用；”

275.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规定的是第 6 条第 1 款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特殊方面（[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 [Foucher v. France](#), § 30）。该项保证了针对被告的诉讼不会在辩方没有充分辩护的情况下发生（[Pakelli v. Germany](#), § 84）。这包含了几项权利：亲自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自己选择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免费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Pakelli v. Germany](#), § 31）。

a. 适用范围

276. 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都受到第 6 条第 3 款 c 项的保护（[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7）。甚至在案件送至法院之前，只要审判可能会因为不符合第 6 条的规定而有严重偏见，该保护就可以适用（[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36; [Öcalan v. Turkey](#)[GC], § 131; [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277. 第 6 条第 3 款 b 项与案件审判准备中的获取法律协助的权利相关，而第 6 条第 3 款 c 项规定的是一项更为概括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Can v. Austria](#), § 54）。

278. 在审前阶段即初步调查阶段，第 6 条第 3 款 c 项的适用方式取决于程序的特征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Berlinski v. Poland](#), § 75）。第 6 条通常要求被告在被警方询问的初级阶段就能得到律师的帮助（[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 [Öcalan v. Turkey](#)[GC], § 131; [Salduz v. Turkey](#)[GC], § 54; [Averi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59;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Dayanan v. Turkey](#), § 31）。然而，这个权力有可能因正当理由而受限制（[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1;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案件的问题在于，从诉讼的整个过程来看，该限制是否剥夺了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即使在例外情况下，存在强有力的理由拒绝律师的介入，所施加的限制也不能不当损害第 6 条规定的被告权利（[Salduz v. Turkey](#)[GC], § 55）。

279.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在上诉法庭的适用方式取决于所涉程序的特征（[Pakelli v. Germany](#), § 29;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1）。必须考虑在国内法律秩序中所进行的整个诉讼过程以及上诉法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1）。也有必要考虑上诉许可程序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上诉法院的权力范围，以及上诉法院呈现并保护申诉人利益的具体形式（[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6）。

b. 亲自辩护

280. 《公约》第 6 条的对象和目标整体上体现了受到刑事指控者参与审讯的权利（[Zana v. Turkey](#)[GC], § 68; [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与此紧紧相连的第 6 条第 3 款 c 项为被告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因此，被告依照个人意愿亲自为自己辩护通常不会违反第 6 条的要求，除非为了实现正义而要受制于其他要求（[Galstyan v. Armenia](#), § 91）。

281. 由本人亲自辩护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允许由被告本人辩护还是为其指派律师，属于缔约国的自由裁量范围，比起本法院，缔约国能够更好地选择国内司法系统中的恰当方式保障被告的权利（[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因此国内法院有权出于对正义的考虑要求指派律师（[Croissant v. Germany](#), § 27; [Lagerblom v. Sweden](#), § 50）。保证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是保护被告利益的一种方式（[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282. 此外，第 6 条第 3 款 c 项并没有提供无限制使用任何辩护理由的权利。当被告选择由自己辩护时，他也就放弃了由律师协助的权利，并有责任用心地进行辩护（[Melin v. France](#), § 25）。受刑事指控者在行使辩护权利时，有意地引起对于刑事案件中证人或其他人的行为错误怀疑，这种怀疑可能会导致对相关人员的惩罚，而被指控者却被认为不会因此受到控告，那这就滥用了辩护权的概念（[Brandstetter v. Austria](#), § 52）。仅仅是被告接下来因为辩护中的指控有可能被控告并不能认为是侵犯了第 6 条第 3 款 c 项的权利。如果依据国内法律或实践后果

过于严重，后续控告的危险会使得被告无法自由行使辩护权，那情况又另当别论（[Brandstetter v. Austria](#), § 53）。

c. 法律协助

283. 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权得到律师的有效辩护是公正审判的基本特征之一（[Salduz v. Turkey](#)[GC], § 51）。作为规则，嫌疑人自被警方拘留或审前羁押起就应得到法律协助（[Dayanan v. Turkey](#), § 31）。通常，被告有效参与刑事审判的权利不仅包括出席审判的权利，也包括必要情况下接受法律协助的权利（[Lagerblom v. Sweden](#), § 49；[Galstyan v. Armenia](#), § 89）。同样，只有申诉人的律师出席不足以代替被告（[Zana v. Turkey](#)[GC], § 72）。

284. 法律代理的权利不依赖于被告是否出席（[Van Geyselghem v. Belgium](#)[GC], § 34；[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99；[Poitrimol v. France](#), § 34）。不论是否被正式传唤，即使没有缺席理由，被告没有出席也不代表可以合法地剥夺其由律师辩护的权利（[Van Geyselghem v. Belgium](#)[GC], § 34；[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 40；）。

285. 任何受刑事指控者都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律师辩护的权利不是绝对的（[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5；[Pakelli v. Germany](#), § 31）。尽管通常应该尊重被告对律师的选择（[Lagerblom v. Sweden](#), § 54），但如果充分的理由认为为了公正利益有必要如此，国内法院可能驳回被告的选择（[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5；[Croissant v. Germany](#), § 29）。举个例子，从整体上考虑，诉讼的特殊性质可能会使专业律师在做口头陈述时有垄断优势（[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 47）。

286. 为了使得法律协助的权利有效且实用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行使该权利时不能依赖于满足形式上的条件，应该由法院来保证审判公正，相应地，保证替被告辩护的律师有机会在审判中获得公正（[Van Geyselghem v. Belgium](#)[GC], § 33；[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 41）。

287. 和其他公正审判权利一样，被告也有可能放弃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Pishchalnikov v. Russia](#), § 77）。然而，在被告通过其行为暗示放弃第 6 条规定的如此重要的权利之前，必须表明他能够合理地预见行为的后果。当被告要求配备律师的时候，额外的保障措施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被告没有律师，他被告知自己权利的机会也就越小，从而其权利受到尊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Pishchalnikov v. Russia](#), § 78）。

d. 法律援助

288.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包含的第三项即最后一项权利——法律援助，在适用时应满足两个条件。

289. 首先，被告必须证明无法支付法律协助费用。然而，他不需要证明“排除所有怀疑”，只要证明存在“某些迹象”就足够了，换言之，可以认定“不存在相反情况”就足够了（[Pakelli v. Germany](#), § 34）。

290. 其次，只有“当为了实现公正利益的要求时”，缔约国才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这必须依据案件的整体事实来判断，不仅包括做出关于申请法律援助的决定时的情形，也包括国内法院依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出裁决时的情形（[Grang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46）

291. 在判断司法利益是否要求被告获得免费的法律代理时，本法院会考虑多个标准，包括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惩罚的严苛程度。原则上，当很有可能剥夺个人自由时，出于正义的考虑应当提供法律代理（[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61; [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3; [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 38）。

292. 关于是否属于“公正利益所要求”的考察，另外两个标准是案件的复杂程度（[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4; [Pham Hoang v. France](#), § 40; [Twalib v. Greece](#), § 53）和被告的个人情况（[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 38）。后者尤其关注被告在没有获得法律协助的情况下自行抗辩的能力，比如，不熟悉法院或司法系统所使用的语言（[Quaranta v. Switzerland](#), § 35; [Twalib v. Greece](#), § 53）。

293. 在采用“司法利益”检验时，不是考察缺乏法律援助是否对辩护造成了“实际损害”，而是考察另一个较为宽松的方面：律师进行协助是否会被认为“在特定情形下似乎是合理的”（[Artico v. Italy](#), § 34-35; [Alimena v. Italy](#), § 20）。

294. 尽管律师和客户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但是当涉及到免费法律援助时，“自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必然受到一定限制。例如，法院在指定辩护律师时必须考虑被告的意愿，但当有充分的理由时可以为司法利益的需要予以否决（[Croissant v. Germany](#), § 29; [Lagerblom v. Sweden](#), § 54）。类似地，第 6 条第 3 款 c 项不能被解释为保护替换公共辩护律师的权利（[Lagerblom v. Sweden](#), §§ 55, 59）。此外，已被一审公正审判定罪的人，即使在客观上没有胜诉的可能，但仍然希望上诉，此时不能以司法利益为由自动提供法律援助（[Monnel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7）。

e. 实用而有效的法律援助

295. 第 6 条第 3 款 c 项直接规定了有权获得“实用有效”的法律援助，仅仅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并不能保证有效的帮助，因为他可能会死亡、重病，或是由于期限过长而不恰当履行职责（[Artico v. Italy](#), § 33）。

296. 得到有效法律援助的权利包括私下和律师交流的权利。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国家可以限制已拘留的嫌疑人和其辩护律师的秘密交流（[Sakhnovskiy v. Russia](#)[GC], § 102）。如果律师无法和当事人会见，并且不能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获得秘密指示，他的帮助作用就很小（[S. v. Switzerland](#), § 48;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58）。任何对律师当事人之间关系的限制，无论是明示或暗示，都不能阻碍被告享有有效的法律援助（[Sakhnovskiy v. Russia](#)[GC], § 102）。监听律师和被告的电话（[Zagarria v. Italy](#), § 36）以及过度限制律师会见被告的次数和时长（[Öcalan v. Turkey](#)[GC], § 135）都可能违反保证提供有效帮助的要求。

297. 然而，缔约国无须为法律援助指派或被告选定的律师的每一个缺点负责（[Lagerblom v. Sweden](#), § 56; [Kamasinski v. Austria](#), § 65）。由于法律职业的独立性，辩护行为实质上是

被告和其法律代理人之间的事务；只有在律师明显无法提供有效代理时，才要求国家介入（[Kamasinski v. Austria](#), § 65;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 41; [Daud v. Portugal](#), § 38）。当律师无法为被告辩护（[Artico v. Italy](#), §§ 33, 36）或没有符合关键的程序要求时，国家就应当负起责任，其中，不符合程序要求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不当的辩护或纯粹的论据瑕疵（[Czekalla v. Portugal](#), §§ 65, 71）。

4. 第 6 条第 3 款 d 项：质询证人

第 6 条第 3 款 d 项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d) 有权在与其不利的人具有相同的条件下，由对其有利的人出庭接受质询；”

a. “证人”的自身含义

298. 不论国内法如何分类，“证人”在公约体系中有其自身含义（[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 45; [S.N.v. Sweden](#), § 45）。如果证词足以作为定罪的基础，就属于控方证据，《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 d 项规定的保护措施就得以适用（[Kaste and Mathisen v. Norway](#), § 53; [Lucà v. Italy](#), § 41）。

299. 该用语包括了共同被告（[Trofimov v. Russia](#), § 37）、受害人（[Vladimir Romanov v. Russia](#), § 97）和专家证人（[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81-82）。

300. 第 6 条第 3 款 d 项也适用于书面证据（[Mirilashvili v. Russia](#), §§ 158-159）。

b. 质询证人的权利

i. 一般原则

301. 第 6 条第 3 款 d 项规定了一项原则：在被告被定罪之前，所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必须正式在公开的审讯中进行对抗抗辩。该原则可能有例外，但不能侵害辩护权，被告应该有充分且适当的机会质询对其不利的证人，不论是在证人陈述时还是在之后的诉讼阶段（[Hümmer v. Germany](#), § 38; [Lucà v. Italy](#), § 39; [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57）。

302. 上述一般原则有两个要求。首先，证人若不出席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其次，如果定罪纯粹或主要依据未经被告质询过的证人证词，不论是在调查还是审判阶段，辩护权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有悖第 6 条的保障（所谓的“唯一或决定性规则”）（[GC], § 119）。

303. 考虑到民主社会中公正司法的权利，只有在极其必要时才可采取限制辩护权的措施。如果有更轻程度的措施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应该采用程度更轻的措施（[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8）。

304. 被告有机会在法官面前和证人对质是公正审判的重要内容（[Tarău v. Romania](#), § 74; [Graviano v. Italy](#), § 38）。

ii. 尽力保证证人出席的义务

305. 在确定证据是否唯一或具有决定性之前，必须先审查证人不出席的正当理由。如果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就有义务调查其缺席是否有正当理由（[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20; [Gabrielyan v. Armenia](#), §§ 78, 81-84）。

306.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要求缔约国积极采取行动使被告能够质询对其不利的证人（[Trofimov v. Russia](#), § 33;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 67）。

307. 由于证人失踪而无法质询的，当局应当尽力保证他们的出庭（[Karpenko v. Russia](#), § 62; [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 51; [Pello v. Estonia](#), § 35; [Bonev v. Bulgaria](#), § 43）。

308. 然而，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做自己无法做的事，如果当局不会因为未能给予被告向证人质询的机会而被起诉，证人缺席就并不意味着要中止诉讼（[Gossa v. Poland](#), § 55; [Haas v. Germany](#) (dec.);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Ubach Morte v. Andorra](#) (dec.)）。

iii. 说明拒绝证人作证理由的义务

309. 尽管对证据的相关性表达观点不是本法院的职责，但不能合法说明拒绝检验或传召证人的理由就等同于限制辩护权，这与公正审判的保障相违背（见 [Popov v. Russia](#), § 188; [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 72; [Wierzbicki v. Poland](#), § 45; 以及, § 34）。

iv. 依赖不在法庭上做出的证人证言

310.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引用调查阶段的证言（[Lucà v. Italy](#), § 40），比如，证人死亡（[Mika v. Sweden](#) (dec.), § 37;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2），证人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Vidgen v. the Netherlands](#), § 47; [Sofr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Craxi v. Italy \(no. 1\)](#), § 86），或者当局试图保证证人出席的努力以失败告终（[Mirilashvili v. Russia](#), § 217）。

311. 鉴于证人缺席对辩护权的影响程度，如果证人没有在之前的任何诉讼阶段被质询过，允许提交证人证言代替出庭作证是最后的手段（[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25）。

312. 处理证人在无法保证公约所要求的辩护权的情况下得到的证据时，需要特别注意（[S.N.v. Sweden](#), § 53;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6）。

313. 当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席对抗式质询时，如果其证言能够被其他证据佐证，那么国内法院就可以将审前程序中证人所做的证言纳入考量范围（[Mirilashvili v. Russia](#), § 217; [Scheper v. the Netherlands](#) (dec.);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 52）。

314. 第 6 条第 3 款 d 项只规定了当证人证言不是在审判阶段做出并且在定罪中起主要或决定作用时，交叉质询证人的可能性（见 [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9）。

315. 即使传闻证据是针对被告的唯一或决定性证据，将其列为证据也不一定会违反第 6 条第 1 款。然而，如果定罪完全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缺席证人的陈述，那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并且要求其他充分的平衡因素，包括强有力的程序保障措施。每个案件都要考虑是否存在适当足够的平衡因素，例如审查证据可靠性的公正合理的措施。由于证据在案件中的重要性，只有当证据足够可靠时才允许在此基础上定罪（[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47）。

v. 匿名证人

316. 尽管匿名证人和缺席证人产生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原则上来看两者的情形并无区别，因为都有可能对被告不利。处理该问题的基本原则为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应当有机会有效质询对其不利的证人（[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 127）。

317. 依据匿名证人的证言定罪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违反公约的规定（[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69；[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2；[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6）。

318. 尽管《公约》第 6 条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考虑证人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生命、自由或人身安全可能属于《公约》第 8 条保护的利益。缔约国应当确保刑事诉讼的安排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公正审判原则要求平衡辩方利益和证人利益（[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0；[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3）。

319. 国内当局必须提出充分的相关理由确保特定证人的身份得到保密（[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1；[Visser v. the Netherlands](#), § 47；[Sapunarescu v. Germany](#) (dec.)；[Dzelili v. Germany](#) (dec.)）。

320. 如果控方证人保持匿名，辩方将会面临刑事程序通常不会涉及的困难。在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必须在通过程序解决辩方面临的障碍（[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 72；[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4；[Haas v. Germany](#) (dec.)）。

321. 不能阻止申诉人审查匿名证人的可靠性（， § 29；[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 59 和 62；[Kostovski v. the Netherlands](#), § 42）。

322. 另外，当审查质询匿名证人的程序是否足以解决对辩方造成的困难时，必须考虑匿名证词对定罪的决定性程度。如果从任何方面来看证言都不具备决定性，那么辩方面临的困难程度则降低（[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 79）。

vi. 性侵犯案件中的证人

323. 涉及性侵的刑事诉讼程序常被认为是对受害人的折磨，特别是当受害人不愿意面对被告的时候。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更是如此。在审查此类诉讼中被告是否受到公正审判时，必须考

考虑受害人的私生活权利。因此，在涉及性侵的刑事案件中，为了保护受害人，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为了保证辩方充分有效行使权利，这类措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为了保证辩方的权利，司法机关可能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消除辩方人员遇到的障碍（[Aigner v. Austria](#), § 37；[D.v. Finland](#), § 43；[F.and M.v. Finland](#), § 58；[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dec.）；[S.N.v. Sweden](#), § 47；[Vronchenko v. Estonia](#), § 56）。

324. 考虑到涉及性侵的刑事案件的特征，第 6 条第 3 款 d 项不能被解释为所有案件中被告或其辩护律师都有权通过交叉询问或其他方式直接询问证人（[S.N.v. Sweden](#), § 52；， § 55）。

325. 被告必须能够观察被质询证人的行为并质疑其证言和可信度（[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 71；[P.S.v. Germany](#), § 26；[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dec.）；[S.N.v. Sweden](#), § 52）。

326. 如果被告没有机会质询证人，仅仅观看证人陈述的视频记录就不足以保障辩方权利（[D.v. Finland](#), § 50；[A.L.v. Finland](#), § 41）。

vii. 向证人提供有利条件以换取证言

327. 以豁免其罪或其他有利条件换取证人证言，是国内当局打击重大犯罪的重要手段。然而，采用此类证言可能有损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可能会出现操纵证言的情况，证人可能会纯粹为了交换有利条件或出于私人报复的目的而编造证言。这类证词有时十分模糊，而且可能会基于未经证实的未必公正的主张而起诉某人，这些问题都是不容低估的。不过，使用这类证言本身并不足以导致诉讼不公（[Cornelis v. the Netherlands](#)（dec.））。

viii. 传闻证据

328.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 d 项暗含了推定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对被告不利的传闻证据。当传闻证据被认为对辩方有利，排除此类证据也是合法的（[Thomas v. United Kingdom](#)（dec.））。

ix. 传唤辩方证人的权利

329. 通常而言，国内法院审核已提交的证据以及辩方试图出示的证据的相关性。同样，第 6 条第 3 款 d 项规定由国内法院审核是否应该传唤证人。这并不要求所有辩方证人都要出席并接受询问，正如“在同等条件下”的用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其真正目的是充分体现“平等手段原则”（见，其他机关，[Perna v. Italy](#)[GC], § 29；[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57）。

330. 辩方主张他未被允许质询特定证人是不足的；为了支持他的请求，辩方还应解释询问证人的理由，而且该证据必须是对于还原事件真相和保护辩方权利来说必不可少的（[Perna v. Italy](#)[GC], § 29；[Bacanu and SC « R » S.A.v. Romania](#), § 75）。

331. 如果辩方要求质询证人的请求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充分理由，并和控告相关，可能有利于辩方，甚至可能导致被告无罪，国内当局必须提出相关理由才能驳回请求（[Topić v. Croatia](#), § 42; [Polyakov v. Russia](#), §§ 34-35）。

332. 第 6 条并没有赋予原告无限制的要求证人出席法庭的权利。通常是由国内法院决定质询证人是否必要或可行（[S.N.v. Sweden](#), § 44;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333. 可能存在例外情形使得法院认为无法质询证人违反了第 6 条（[Dorokhov v. Russia](#), § 65; [Popov v. Russia](#), § 188; [Bricmont v. Belgium](#), § 89）。

5. 第 6 条第 3 款 e 项：翻译

第 6 条第 3 款 e □

“3. 凡受刑事罪指控者具有下列最低限度的权利：

.....

（e）如果他不懂或者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可以请求免费的译员协助翻译。”

a. 如果被告“听不懂或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

334. 免费获得译员帮助的权利只有在被告听不懂或不会讲法院所使用的工作语言时才适用（[K.v. France](#) (dec.)）。被告理解该语言的，不能坚持要求译员帮助他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辩护，包括他所属少数民族的语言（[K.v. France](#) (dec.)；[Bideault v. France](#) (dec.)；也见 [Lagerblom v. Sweden](#), § 62）。

335. 通常来说，当被告由律师代理时，只有律师理解法院所使用的语言而被告不理解，这是不够的。诉讼程序要求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该要求包括参与审讯的权利，要求被告能够理解诉讼程序从而告知律师辩护要点（[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38）。

336. 第 6 条第 3 款 e 项不适用于被告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只适用于被告和法官之间（[X.v. Austria](#) (dec.)，p. 68）。

337. 被告可以放弃获得译员帮助的权利，但这必须由被告而非律师决定（[Kamasinski v. Austria](#), § 80）。

b. 刑事诉讼中的保护要素

338. 第 6 条第 3 款 e 项保证了被告在诉讼中有权请求译员免费翻译文件或陈述，这对于被告理解法院所使用的语言从而获得公正审判来说是必要的（[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8; [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Hermi v. Italy](#)[GC], § 69; [Lagerblom v. Sweden](#), § 61）。

339. 第 6 条第 3 款 e 项不仅适用于审讯阶段的口头陈述，也适用于书面材料和审前程序（[Kamasinski v. Austria](#), § 74; [Hermi v. Italy](#)[GC], § 70）。

340. 然而，也没必要翻译诉讼中所有的纸质证据或官方文件（[Kamasinski v. Austria](#), § 74）。比如，没有纸质翻译的判决书本身并不违反第 6 条第 3 款 e 项（[Kamasinski v. Austria](#), § 85）。第 6 条第 3 款 e 项指向的是“口译”，而非“笔译”，这意味着口译足以满足公约要求（（dec.）；[Hermi v. Italy](#)[GC], § 70）。

341. 总而言之，译员的帮助必须足以使得被告理解案件从而为自己辩护，特别是能够在法庭上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Kamasinski v. Austria](#), § 74；[Hermi v. Italy](#)[GC], § 70；[Güngör v. Germany](#)（dec.）；[Protopapa v. Turkey](#), § 80）。

c. “免费”协助

342. 提供免费协助的义务不依赖于被告的收入；为被告提供译员是国家刑事司法公正体系提供的便利条件之一。然而，被告可能要为他未能参加的审讯中提供工作的译员付费（[Fedele v. Germany](#)（dec.））。

343. 不能在之后向被告索取译员费用（[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6）。第 6 条第 3 款 e 项意味着国内法院让已定罪之人承担费用等同于限制了公约所提供的保障（[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 42；[Işyar v. Bulgaria](#), § 45；[Öztürk v. Germany](#), § 58）。

d. 翻译的条件

344. 在第 6 条第 3 款 e 项规定译员协助被告的具体条件是不合适的。译员不属于第 6 条第 1 款规定的法院或审判庭的一员，对其独立和公正性也没有正式的要求。译员向被告提供的帮助必须有效地帮助其进行辩护，不能损害诉讼公正（[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e. 积极的义务

345. 法官应当询问申诉人，确认其是否确实需要译员，尤其是在律师已经向法官反映过和申诉人沟通困难的情况下。法官必须保证译员的缺席不会影响申诉人充分参与至关重要的事件（[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346. 辩护行为实质上是被告和其律师之间的事务（[Kamasinski v. Austria](#), § 65, [Stanford v. the United Kingdom](#), § 28），诉讼公正（也包括有可能不为外籍被告提供翻译的情况）的最终守卫者是国内法院（[Cusc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Hermi v. Italy](#)[GC], § 72；[Katritsch v. France](#), § 44）。

347. 被告的语言能力非常重要，为了判断要理解法院所使用的语言对于被告是否太过困难，法院也必须审查被告被指控的罪名性质以及国内当局向被告传达的所有通知（[Hermi v. Italy](#)[GC], § 71；[Katritsch v. France](#), § 41；[Saman v. Turkey](#), § 30；[Güngör v. Germany](#)（dec.））。

348. 鉴于保证第 6 条第 3 款 e 项的权利实用有效的需要，当局的义务不仅限于任命译员，也包括在特定情形下保证翻译的妥善性（[Kamasinski v. Austria](#), § 74；[Hermi v. Italy](#)[GC], § 70；[Protopapa v. Turkey](#), § 80）。

VI.第 6 条的域外效力

349. 公约不要求缔约国在第三方国家或地区适用他们的标准（[Droz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 110）。缔约国没有义务审查第三方国家进行的包含引渡的审判是否符合第 6 条的所有要求。

A.公然违背公正

350. 根据本法院的案例法，在某些引渡或驱逐的情形下，个人可能无法获得公正审判，也就是被请求国公然违背公正，此时可能会产生与第 6 条有关的问题。该原则首先在索林诉英国案（[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113））中得以确立，之后在许多案件中得到本法院的确认（[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GC], §§ 90-91;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9; [Ahorugeze v. Sweden](#), § 115;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58）。

351. “公然违背公正”被认为等同于明显违反第 6 条或其所体现原则的审判（[Sejdovic v. Italy](#)[GC], § 84; [Stoichkov v. Bulgaria](#), § 56; [Droz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 110）。尽管还没有更精准的定义，本法院仍然认为特定的几类不公的形式等同于公然违背公正，包括：

- 缺席判决，并且之后没有依据案件事实重新判决的可能性（[Einhorn v. France \(dec.\)](#), § 33; [Sejdovic v. Italy](#)[GC], § 84; [Stoichkov v. Bulgaria](#), § 56）；
- 审判本质上是简易程序，完全忽略了辩方权利（[Bader and Kanbor v. Sweden](#), § 47）；
- 拘留的合法性没有受到公正独立的审判庭审核（[Al-Moayad v. Germany \(dec.\)](#), § 101）；
- 有计划地故意拒绝律师介入，特别是针对拘留在国外的公民（[Al-Moayad v. Germany \(dec.\)](#)）；
- 违反第 3 条，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通过虐待嫌疑人或第三人得到的供述（[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67; [El Haski v. Belgium](#), § 85）。

352. 自索林诉英国案后二十年，也就是 2012 年，本法院在奥斯曼诉英国案（[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中首次判决引渡或驱逐事实上违反了第 6 条。如前述，这表明判断是否“公然违背公正”的标准很严格，它不单单要求缔约国违反公约第 6 条，不遵守规则或缺少保障措施，还要求对于《公约》第 6 条保障的公正审判的基本权利的违反，达到了废弃或损毁第 6 条保障的权利实质的程度（[Ahorugeze v. Sweden](#), § 115;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60）。

B. “真实的风险”：审查标准和证明责任

353. 在审查引渡或驱逐是否公然违背公正时，本法院认为应当适用第 3 条对引渡或驱逐的审查标准。因此，应当由申诉人提出充足的理由证明，如果被缔约国驱逐，他将会遭受公然违背

公正的真实风险。在申诉人提出这类证据后，由政府负责排除怀疑（[Ahorugeze v. Sweden](#), § 116;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272-280; [El Haski v. Belgium](#), § 86; [Saadi v. Italy](#)[GC], § 129）。

354.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公然违背公正的真实风险，本法院必须考虑整体情形以及个人情况，审查遣返申诉人返回其国家的可预见后果（[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25; [Saadi v. Italy](#)[GC], § 130）。缔约国必须在驱逐时就已知或应知的事实审查风险的存在（[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25; [Saadi v. Italy](#)[GC], § 133）。不过，如果驱逐或转移行为在审查案件之日前就已经发生，本法院应知道随后披露的消息（[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 149;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GC], § 69）。

援引案例一览

本指南援引的判例法涉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或报告。

除非另行指明，所有参考皆是本法院审判庭依法作出的判决。缩写“（dec.）”是指该处援引为本法院裁定，“[GC]”是指该案件由大审判庭审判。

本指南电子版中援引案例的超链接直接跳转 HUDOC 数据库（<<http://hudoc.echr.coe.int>>）。该数据库提供本法院（包括大审判庭、审判庭和委员会的判决、裁定和相关案例、咨询意见以及案例法信息注解中的法律总结）、委员会（决定和报告）和部长委员会（决议）的判例法。

本法院以英语和/或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发布判决和裁定。HUDOC 也包含许多重要案例的近 30 种非官方言语的翻译，以及由第三方制作的大约 100 个在线案例汇总的链接。

[A.v. Austria](#)（dec.）， no. 16266/90， 7 May 1990

[A.L.v. Finland](#)， no.23220/04， 27 January 2009

[A.L.v. Germany](#)， no.72758/01， 28 April 2005

[A. Menarini Diagnostics S.R.L.v. Italy](#)， no. 43509/08， 27 September 2011*

[Abdoella v. the Netherlands](#)， 25 November 1992， Series A no. 248-A

[Accardi and Others v. Italy](#)（dec.）， no. 30598/02， ECHR 2005-II

[Adiletta and Others v. Italy](#)， 19 February 1991， Series A no. 197-E

[Adolf v. Austria](#)， no. 8269/78， 26 March 1982， series A no. 49

[AGOSI v. the United Kingdom](#)， 24 October 1986， Series A no. 108

[Ahorugeze v. Sweden](#)， no. 37075/09， 27 October 2011

[Aigner v. Austria](#)， no. 28328/03， 10 May 2012

[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5 May 1995， Series A no. 316-A

[Akay v. Turkey](#)（dec.）， no. 34501/97， 19 February 2002*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nos.7299/75 and 7496/76， 10 February 1983， Series A no. 58

[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s. 26766/05 and 22228/06， ECHR 2011

[Al-Moayad v. Germany](#)（dec.）， no.35865/03， 20 February 2007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no.61498/08， ECHR 2010

[Ali v. Romania](#)， no. 20307/02， 9 November 2010

[Alimena v. Italy](#)， 19 February 1991， Series A no. 195-D

[All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8539/99， ECHR 2002-IX

[Allen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 25424/09， ECHR 2013

[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10 February 1995, Series A no. 308

[Arrigo and Vella v. Malta](#) (dec.), no. 6569/04, 10 May 2005

[Artico v. Italy](#), 13 May 1980, Series A no. 37

[Assanidze v. Georgia](#)[GC], no. 71503/01, ECHR 2004-II

[Averi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6408/97, ECHR 2000-VI

[B.v. Austria](#), 28 March 1990, Series A no. 175

[B. and P.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36337/97, 35974/97, ECHR 2001-III

[Bacanu and SC R S.A.v. Romania](#), no. 4411/04, 3 March 2009

[Bäckström and Andersson v. Sweden](#) (dec.), no. 67930/01, 5 September 2006

[Bader and Kanbor v. Sweden](#), no. 13284/04, ECHR 2005-XI

[Baggetta v. Italy](#), 25 June 1987, Series A no. 119

[Balsyte-Lideikiene v. Lithuania](#), no. 72596/01, 4 November 2008

[Bannikova v. Russia](#), no. 18757/06, 4 November 2010

[Barberà, Messegue and Jabardo v. Spain](#), no.10590/83, 6 December 1988, Series A no. 146

[Baucher v. France](#), no. 53640/00, 24 July 2007*

[Belashev v. Russia](#), no. 28617/03, 4 December 2008

[Belilos v. Switzerland](#), no.10328/83, 29 April 1988, Series A no. 132

[Bellerín Lagares v. Spain](#) (dec.), no. 31548/02, 4 November 2003*

[Bendenoun v. France](#), 12547/86, 24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284

[Be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Berlinski v. Poland](#), nos.27715/95 and 30209/96, 20 June 2002

[Bideault v. France](#) (dec.), no. 11261/8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December 1987, DR 48,
p. 232

[Birutis and Others v. Lithuania](#), nos. 47698/99 and 48115/99, 28 March 2002

[Block v. Hungary](#), no. 56282/09, 25 January 2011

[Bobek v. Poland](#), no. 68761/01, 17 July 2007

[Bocos-Cuesta v. the Netherlands](#), no. 54789/00, 10 November 2005

[Boddaert v. Belgium](#), 12 October 1992, Series A no. 235-D

[Böhmer v. Germany](#), no. 37568/97, 3 October 2002

[Boldea v. Romania](#), no. 19997/02, 15 February 2007

[Bonev v. Bulgaria](#), no. 60018/00, 8 June 2006

[Bonisch v. Austria](#), 6 May 1985, Series A no. 92

[Bonzi v. Switzerland](#), no. 7854/77,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2 July 1978, DR 12, p. 188

[Boulois v. Luxembourg](#)[GC], no. 37575/04, 3 April 2012, ECHR 2012

[Borisova v. Bulgaria](#), no. 56891/00, 21 December 2006

[Borgers v. Belgium](#), 30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4-B

[Brandstetter v. Austria](#), 28 August 1991, Series A no. 211

[Brenn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9846/98, ECHR 2001-X

[Bricmont v. Belgium](#), no. 10857/84,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58

[Brozicek v. Italy](#), no. 10964/84, 19 Dec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7

[Brusco v. France](#), no. 1466/07, 14 October 2010

[Buijen v. Germany](#), no. 27804/05, 1 April 2010

[Bulut v. Austria](#), 22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

[Burak Hun v. Turkey](#), no. 17570/04, 15 December 2009

[Buscemi v. Italy](#), no. 29569/95, ECHR 1999-VI

[Butkevicius v. Lithuania](#), no. 48297/99, ECHR 2002-II (extracts)

[Bykov v. Russia](#)[GC], no.4378/02, 10 March 2009

[Campbell and F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7819/77 and 7878/77, 28 June 1984, Series A no. 80

[C.v. Italy](#), no. 10889/8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1 May 1988, DR 56, p. 40

[C.G.P.v. the Netherlands](#), no. 29835/9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January 1997

[Calabrò v. Italy and Germany](#) (dec.), no. 59895/00, ECHR 2002-V

[Caldas Ramirez de Arrellano v. Spain](#) (dec.), no. 68874/01, ECHR 2003-I (extracts)

[Can v. Austria](#), no. 9300/81, Commission's report of 12 July 1984, Series A no. 96

[Capeau v. Belgium](#), no. 42914/98, ECHR 2005-I

[Casse v. Luxembourg](#), no.40327/02, 27 April 2006*

[Castillo Algar v. Spain](#),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Célice v. France](#), no.14166/09, 8 March 2012

[Chichlian and Ekindjian v. France](#), no. 10959/84, Commission report of 16 March 1989, Series A no. 162-B*

[Clarke v. United Kingdom](#) (dec.), no.23695/02, 25 August 2005

[Clinique Mozart SARL v. France](#), no.46098/99, 8 June 2004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nos. 32492/96, 32547/96, 32548/96, 33209/96 and 33210/96, ECHR 2000-VII

[Collozza and Rubinat v. Italy](#), no. 9024/80, Commission report of 5 May 1983, Series A no. 89

[Constantin and Stoian v. Romania](#), nos. 23782/06 and 46629/06, 29 September 2009

[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48843/99, 16 December 2003

[Cornelis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994/03, ECHR 2004-V (extracts)

[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dec.), no. 48188/99, ECHR 2001-XII

[C.P. and Others v. France](#), no. 36009/97, 1 August 2000*

[Craxi v. Italy \(no. 1\)](#), no. 34896/97, 5 December 2002*

[Croissant v. Germany](#), 25 September 1992, Series A no. 237-B

[Cu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no.32771/96, 24 September 2002

[Czekalla v. Portugal](#), no. 38830/97, ECHR 2002-VIII

[D.v. Finland](#), no. 30542/04, § 43, 7 July 2009

[Daktaras v. Lithuania](#), no. 42095/98, ECHR 2000-X

[Daktaras v. Lithuania](#) (dec.) , no. 42095/98, 11 January 2000

[Dallos v. Hungary](#), no. 29082/95, 1 March 2001, ECHR 2001-II

[Damir Sibgatullin v. Russia](#), no. 1413/05, 24 April 2012

[Daud v. Portugal](#), 21 April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Davran v. Turkey](#), no. 18342/03, 3 November 2009

[Dayanan v. Turkey](#), no. 7377/03, 13 October 2009

[De Cubber v. Belgium](#), 26 October 1984, Series A no. 86

[Delcourt v. Belgium](#), 17 January 1970, Series A no. 11

[Demicoli v. Malta](#), no. 13057/87, 27 August 1991, Series A no. 210

[Deweere v. Belgium](#), no. 6903/75, 27 February 1980, Series A no. 35

[De Salvador Torres v. Spain](#), 24 Octo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Didu v. Romania](#), no. 34814/02, 14 April 2009*

[Diriöz v. Turkey](#), no. 38560/04, 31 May 2012

[Dobbertin v. France](#), 25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6-D

[Doorson v. the Netherlands](#), no. 20524/92, 26 March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

[Dorokhov v. Russia](#), no. 66802/01, 14 February 2008

[Dorozhko and Pozharskiy v. Estonia](#), nos. 14659/04 and 16855/04, 24 April 2008

[Döry v. Sweden](#), no. 28394/95, 12 November 2002

[Dowset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9482/98, ECHR 2003-VII

[Drassich v. Italy](#), no. 25575/04, 11 December 2007*

[Drozd and Janousek v. France and Spain](#), 26 June 1992, Series A no.240

[Dubus S.A.v. France](#), no. 5242/04, 11 June 2009*

[Dzelili v. Germany](#) (dec.) no. 15065/05, 29 September 2009

[Eckle v. Germany](#), no.8130/78, 15 July 1982, series A no. 51

[Edwards and Lew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s. 39647/98, 40461/98, 27 October 2004, ECHR 2004-X

[Einhorn v. France](#) (dec.) , no. 71555/01, ECHR 2001-XI

[El Haski v. Belgium](#), no. 649/08, 25 September 2012

[Enea v. Italy](#)[GC], no. 74912/01, ECHR 2009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nos. 5100/71, 5101/71, 5102/71, 5354/72 and 5370/72 , 8 June 1976, Series A no. 22

[Erdogan v. Turkey](#), no. 14723/89,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July 1992, DR 73, p. 81

[Ergin v. Turkey \(no. 6\)](#) , no. 47533/99, ECHR 2006-VI (extracts)

[Eurofinacom v. France](#) (dec.) , no. 58753/00, ECHR 2004-VII

[Ezeh and Connor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s. 39665/98 and 40086/98, 9 October 2003, ECHR 2003-X

[F. and M.v. Finland](#), no. 22508/02, 17 July 2007

[Falk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66273/01, ECHR 2004-XI

[Fatullayev v. Azerbaijan](#), no. 40984/07, 22 April 2010

[Fazliyski v. Bulgaria](#), no. 40908/05, 16 April 2013

[Fedele v. Germany](#) (dec.), no. 11311/84, 9 December 1987

[Fejde v. Sweden](#), 29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2-C

[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 v. Italy](#), 7 August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Fey v. Austria](#), 24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5-A

[Filippini v. San Marino](#) (dec.), no.10526/02, 28 August 2003*

[Findlay v. the United Kingdom](#), 25 Februar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

[Fischer v. Austria](#) (dec.), no. 27569/02, ECHR 2003-VI

[Foucher v. France](#), 18 March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

[Fruni v. Slovakia](#), no. 8014/07, 21 June 2011

[Funke v. France](#), 25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6-A

[G.B.v. France](#), no. 44069/98, ECHR 2001-X

[Gabrielyan v. Armenia](#), no. 8088/05, 10 April 2012

[Gäfgen v. Germany](#)[GC], no. 22978/05, ECHR 2010

[Galstyan v. Armenia](#), no. 26986/03, 15 November 2007

[Garycki v. Poland](#), no. 14348/02, 6 February 2007

[Gast and Popp v. Germany](#), no. 29357/95, ECHR 2000-II

[Geerings v. the Netherlands](#), no. 30810/03, ECHR 2007-III

[Giosakis v. Greece \(no. 3\)](#), no. 5689/08, 3 May 2011*

[Goddi v. Italy](#), no. 8966/80, 9 April 1984, Series A no. 76

[Goktepe v. Belgium](#), no. 50372/99, 2 June 2005*

[Gorgiladze v. Georgia](#), no.4313/04, 20 October 2009*

[Gossa v. Poland](#), no. 47986/99, 9 January 2007

[Gómez de Liaño y Botella v. Spain](#), no. 21369/04, 22 July 2008*

[Gradinger v. Austria](#), 23 October 1995, Series A no. 328-C

[Granger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March 1990, Series A no. 174

[Graviano v. Italy](#), no. 10075/02, 10 February 2005*

[Grayson and Barnham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19955/05 and 15085/06, 23 September 2008

[Gregačević v. Croatia](#), no. 58331/09, 10 July 2012

[Griev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 57067/00, ECHR 2003-XII (extracts)

[Guérin v. France](#), 29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Guisset v. France](#), no.33933/96, ECHR 2000-IX

[Güngör v. Germany](#) (dec.), no.31540/96, 24 January 2002*

[Gurguchiani v. Spain](#), no. 16012/06, 15 December 2009

[Haas v. Germany](#) (dec.), no. 73047/01, 17 November 2005

[Hadjianastassiou v. Greece](#), no.12945/87, 16 December 1992, Series A no. 252

[Hamer v. Belgium](#), no. 21861/03, ECHR 2007-V (extracts)

[Hanif and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52999/08 and 61779/08, 20 December 2011

[Harabin v. Slovakia](#), no. 58688/11, 20 November 2012

[Harutyunyan v. Armenia](#), no. 36549/03, ECHR 2007-III

[Hauschildt v. Denmark](#), 24 May 1989, Series A no. 154

[Heaney and McGuinness v. Ireland](#), no. 34720/97, ECHR 2000-XII

[Heglas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5935/02, 1 March 2007

[Henryk Urban and Ryszard Urban v. Poland](#), no. 23614/08, 30 November 2010

[Hermi v. Italy](#) [GC], no. 18114/02, ECHR 2006-XII

[Holm v. Sweden](#), 25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9-A

[Hümmer v. Germany](#), no. 26171/07, 19 July 2012

[Husain v. Italy](#) (dec.), no. 18913/03, ECHR 2005-III

[Hüseyn Turan v. Turkey](#), no. 11529/02, 4 March 2008

[Huseyn and Others v. Azerbaijan](#), nos. 35485/05, 45553/05, 35680/05 and 36085/05, 26 July 2011

[I.A.v. France](#),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I.H. and Others v. Austria](#), no. 42780/98, 20 April 2006

[Iglin v. Ukraine](#), no. 39908/05, 12 January 2012

[Imbrioscia v. Switzerland](#), 24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5

[Incal v. Turkey](#), 9 June 1998, Reports 1998-IV

[Ibrahim Ülger v. Turkey](#), no. 57250/00, 29 July 2004*

[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8 January 1978, Series A no. 25

[Ismoilov and Others v. Russia](#), no. 2947/06, 24 April 2008

[İşyar v. Bulgaria](#), no. 391/03, 20 November 2008

[Jalloh v. Germany](#) [GC], no. 54810/00, ECHR 2006-IX

[Janosevic v. Sweden](#), no. 34619/97, ECHR 2002-VII

[Jas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7052/95, 16 February 2000

[John Murray v. the United Kingdom](#), 8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Jorgic v. Germany](#), no. 74613/01, 12 July 2007, ECHR 2007-III

[Josseaume v. France](#), no. 39243/10, 8 March 2012

[Judg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5863/10, 8 February 2011

[Juha Nuutinen v. Finland](#), no. 45830/99, 24 April 2007

[Jussila v. Finland](#) [GC], no. 73053/01, 23 November 2006, ECHR 2006-XIV

[K.v. France](#), no. 10210/8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7 December 1983, DR 35, p. 203

[Kamasinski v. Austria](#), no. 9783/82, 19 Dec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8

[Karpenko v. Russia](#), no. 5605/04, 13 March 2012

[Kaste and Mathisen v. Norway](#), nos. 18885/04, 21166/04, 9 November 2006, ECHR 2006-XIII

[Kart v. Turkey](#) [GC], no. 8917/05, ECHR 2009 (extracts)

[Katritsch v. France](#), no. 22575/08, 4 November 2010

[Khalifaoui v. France](#), no. 34791/97, ECHR 1999-IX

[Kh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5394/97, ECHR 2000-V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nos. 11082/06 and 13772/05, 25 July 2013

[Khudobin v. Russia](#), no. 59696/00, ECHR 2006-XII (extracts)

[Khuzhin and Others v. Russia](#), no. 13470/02, 23 October 2008

[Klimentyev v. Russia](#), no. 46503/99, 16 November 2006

[Klouvi v. France](#), no.30754/03, 30 June 2011*

[Kok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43149/98, ECHR 2000-VI

[König v. Germany](#), no. 6232/73, 28 June 1978, Series A no. 27

[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GC], no. 30078/06, ECHR 2012 (extracts)

[Konstas v. Greece](#), no. 53466/07, 24 May 2011

[Kontalexis v. Greece](#), no. 59000/08, 31 May 2011*

[Kostovski v. the Netherlands](#), 20 November 1989, Series A no. 166

[Krasniki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51277/99, 28 February 2006)

[Kremzow v. Austria](#), 21 September 1993, Series A no. 268-B

[Krestovskiy v. Russia](#), no. 14040/03, 28 October 2010

[Kriegisch v. Germany](#) (dec.), no. 21698/06, 23 November 2010

[Kröcher and Möller v. Switzerland](#), no. 8463/78,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July 1981, DR 26

[Krombach v. France](#), no. 29731/96, ECHR 2001-II

[Kulikowski v. Poland](#), no. 18353/03, 19 May 2009

[Kuopila v. Finland](#), no.27752/95, 27 April 2000

[Kuzmin v. Russia](#), no. 58939/00, 18 March 2010*

[Kyprianou v. Cyprus](#) [GC], no. 73797/01, ECHR 2005-XIII

[Labergere v. France](#), no.16846/02, 26 September 2006

[Lacadena Calero v. Spain](#), no. 23002/07, 22 November 2011*

[Lagerblom v. Sweden](#), no.26891/95, 14 January 2003

[Lanz v. Austria](#), no. 24430/94, 31 January 2002

[Lauko v. Slovakia](#), 2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

[Lavents v. Latvia](#), no.58442/00, 28 November 2002

[Legillon v. France](#), no. 53406/10, 10 January 2013

[Lilly v. France](#) (dec.), no 53892/00, 3 December 2002*

[Löffler v. Austria](#), no. 30546/96, 3 October 2000

[Lucà v. Italy](#), no. 33354/96, ECHR 2001-II

[Luedicke, Belkacem and Koç v. Germany](#), 28 November 1978, Series A no. 29

[Lundkvist v. Sweden](#) (dec.), no. 48518/99, ECHR 2003-XI

[Lutz v. Germany](#), no. 9912/82, 25 August 1987, Series A no. 123

[Maaouia v. France](#)[GC], no. 39652/98, ECHR 2000-X

[Magee v. the United Kingdom](#), no.28135/95, ECHR 2000-VI

[Makhfi v. France](#), no. 59335/00, 19 October 2004*

[Malige v. France](#), 23 Septem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

[Malininas v. Lithuania](#), no. 10071/04, 1 July 2008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GC], nos. 46827/99 and 46951/99, ECHR 2005-I

[Marpa Zeeland B.V. and Metal Welding B.V.v. the Netherlands](#), no. 46300/99, ECHR 2004-X (extracts)

[Marti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40426/98, 24 October 2006

[Martinie v. France](#) [GC], no. 58675/00, ECHR 2006-VI

[Matijsevic v. Serbia](#), no. 23037/04, 19 September 2006

[Mattick v. Germany](#) (dec.), no. 62116/00, ECHR 2005-VII

[Mattoccia v. Italy](#), no. 23969/94, ECHR 2000-IX

[Matyjek v. Poland](#), no. 38184/03, 24 April 2007

[Mayzit v. Russia](#), no. 63378/00, 20 January 2005

[McFarlane v. Ireland](#)[GC], no. 31333/06, 10 September 2010

[Meftah and Others v. France](#)[GC], nos. 32911/96, 35237/97 and 34595/97, ECHR 2002-VII

[Melin v. France](#), 22 June 1993, Series A no. 261-A

[Micallef v. Malta](#) [GC], no. 17056/06, ECHR 2009

[Mieg de Boofzheim v. France](#) (dec.), no. 52938/99, ECHR 2002-X

[Mika v. Sweden](#) (dec.), no. 31243/06, 27 January 2009

[Milasi v. Italy](#), 25 June 1987, Series A no. 119

[Milinienė v. Lithuania](#), no. 74355/01, 24 June 2008

[Mill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45825/99, 45826/99 and 45827/99, 26 October 2004

[Miminoshvili v. Russia](#), no. 20197/03, 28 June 2011

[Minelli v. Switzerland](#), no. 8660/79, 25 March 1983, Series A no. 62

[Mircea v. Romania](#), no. 41250/02, 29 March 2007*

[Mirilashvili v. Russia](#), no. 6293/04, 11 December 2008

[Monedero Angora v. Spain](#) (dec.), no.41138/05, ECHR 2008

[Monnell and Morris v. United Kingdom](#), nos. 9562/81 and 9818/82, 2 March 1987

[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 no.59290/00, ECHR 2003-VII

[Montera v. Italy](#) (dec.), no. 64713/01, 9 July 2002*

[Moiseyev v. Russia](#), no. 62936/00, 9 October 2008

[Moulet v. France](#), (dec.), no.27521/04, 13 September 2007

[Mezmaric v. Croatia](#), no. 71615/01, 15 July 2005

[Mustafa Kamal Mustafa \(Abu Hamza\) \(No. 1\)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1411/07 , 18 January 2011

[Natunen v. Finland](#), no.21022/04, 31 March 2009

[Navone and Others v. Monaco](#), nos. 62880/11, 62892/11 and 62899/11, 24 October 2013

[Nerattini v. Greece](#), no. 43529/07, 18 December 2008

[Nešťák v. Slovakia](#), no. 65559/01, 27 February 2007

[Neumeister v. Austria](#),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8

[Nicoleta Gheorghe v. Romania](#), no. 23470/05, 3 April 2012

[Ninn-Hansen v. Denmark](#) (dec.), no. 28972/75, ECHR 1999-V

[Nortier v. the Netherlands](#), 24 August 1993, Series A no. 267

[Nurmagomedov v. Russia](#), no. 30138/02, 7 June 2007

[O.v. Norway](#), no. 29327/95, ECHR 2003-II

[OAO Neftyanaya Kompaniya Yukos v. Russia](#), no. 14902/04, 20 September 2011

[Oberschlick v. Austria](#) (no. 1), 23 May 1991, Series A no. 204

[GC], no. 46221/99, ECHR 2005-IV

[Öcalan v. Turkey](#) (dec.), no. 5980/07, 6 July 2010

[O'Halloran and Franc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s. 15809/02 and 25624/02, ECHR 2007-VIII

[Omar v. France](#), 29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Othman \(Abu Qat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8139/09, ECHR 2012

[Öztürk v. Germany](#), no. 8544/79, 21 February 1984, Series A no. 73

[P.G. and J.H.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4787/98, ECHR 2001-IX

[P.S.v. Germany](#), no. 33900/96, 20 December 2001

[Padin Gestoso v. Spain](#) (dec.), no. 39519/98, ECHR 1999-II (extracts)

[Padovani v. Italy](#), 26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7-B

[Pakelli v. Germany](#), no. 8398/78, Commission's report of 12 December 1981

[Paksas v. Lithuania](#)[GC], no. 34932/04, ECHR 2011 (extracts)

[Pandjikidze and Others v. Georgia](#), no. 30323/02, 27 October 2009

[Pandy v. Belgium](#), no. 13583/02, 21 September 2006*

[Papon v. France](#) (dec.), no. 54210/00, ECHR 2001-XII

[Papon v. France \(no. 2\)](#), no.54210/00, ECHR 2002-VII

[Paraponiaris v. Greece](#), no. 42132/06, 25 September 2008*

[Parlov-Tkalcic v. Croatia](#), no. 24810/06, 22 December 2009

[Pedersen and Baadsgaard v. Denmark](#), no. 49017/99, 19 June 2003

[Pélissier and Sassi v. France](#)[GC], no.25444/94, ECHR 1999-II

[Pelladoah v. the Netherlands](#), 22 Sept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7-B

[Pello v. Estonia](#), no. 11423/03, 12 April 2007

[Penev v. Bulgaria](#), no. 20494/04, 7 January 2010

[Peñafiel Salgado v. Spain](#) (dec.), no.65964/01, 16 April 2002*

[Perna v. Italy](#)[GC], no. 48898/99, ECHR 2003-V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no. 62435/00, ECHR 2003-VII

[Petyo Petkov v. Bulgaria](#), no. 32130/03, 7 January 2010*

[Pfeifer and Plankl v. Austria](#), 25 February 1992, Series A no. 227

[Pham Hoang v. France](#), 25 September 1992, Series A no. 243

[Phillip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1087/98, ECHR 2001-VII

[Pierre-Bloch v. France](#), 21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Piersack v. Belgium](#), 1 October 1982, Series A no. 53

[Pishchalnikov v. Russia](#), no. 7025/04, 24 September 2009

[Planka v. Austria](#), no. 25852/94,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May 1996

[Poitrimol v. France](#), 23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7-A

[Polyakov v. Russia](#), no. 77018/01, 29 January 2009

[Poncelet v. Belgium](#), no. 44418/07, 30 March 2010*

[Popov v. Russia](#), no. 26853/04, 13 July 2006

[Popovici v. Moldova](#), nos. 289/04 and 41194/04, 27 November 2007

[Poppe v. the Netherlands](#), no. 32271/04, 24 March 2009

[Posokhov v. Russia](#), no. 63486/00, 04 March 2003, ECHR 2003-IV

[Previti v. Italy](#) (dec.) no. 45291/06, 8 December 2009*

[Priebke v. Italy](#) (dec.) , no. 48799/99, 5 April 2001*

[Protopapa v. Turkey](#), no. 16084/90, 24 February 2009

[Pullar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Putz v. Austria](#), 22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Quaranta v. Switzerland](#), 24 May 1991, Series A no. 205

[R.v. Belgium](#), no. 15957/9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30 March 1992, DR 72

[R.v. United Kingdom](#) (dec.) , no. 33506/05 4 January 2007

[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no. 53984/00, ECHR 2004-II

[Raimondo v. Italy](#), 22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1-A

[Ramanauskas v. Lithuania](#)[GC], no. 74420/01, ECHR 2008

[Rasmussen v. Poland](#), no. 38886/05, 28 April 2009

[Ravnsborg v. Sweden](#), 23 March 1994, Series A no. 283-B

[Raza v. Bulgaria](#), no. 31465/08, 11 February 2010

[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 (dec.) , nos. 41340/98 and 41342-44/98, 3 October 2000*

[Reinhardt and Slimane-Kaïd v. France](#), 31 March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Richert v. Poland](#), no.54809/07, 25 October 2011

[Riepan v. Austria](#), no. 35115/97, ECHR 2000-XII

[Ringeisen v. Austria](#), no.2614/65, 16 July 1971, Series A no. 13

[Ringvold v. Norway](#), no. 34964/97, ECHR 2003-II

[Rouille v. France](#), no. 50268/99, 6 January 2004

[Rowe and Davis 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 28901/95, ECHR 2000-II

[Ruiz Torija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303-A
[Rupa v. Romania \(no. 1\)](#), no.58478/00, 16 December 2008*
[Rushiti v. Austria](#), no. 28389/95, 21 March 2000
[S. v. Switzerland](#), 28 November 1991, Series A no. 220
[S.N.v. Sweden](#), no. 34209/96, ECHR 2002-V
[Saadi v. Italy](#)[GC], no. 37201/06, ECHR 2008
[Saccoccia v Austria](#) (dec.), no69917/01, 5 July 2007
[Sadak and Others v. Turkey \(no. 1\)](#), nos. 29900/96, 29901/96, 29902/96 and 29903/96,

ECHR 2001-VIII

[Şahiner v. Turkey](#), no. 29279/95, 25 September 2001
[Sainte-Marie v. France](#), 16 December 1992, Series A no. 253-A
[Sakhnovskiy v. Russia](#)[GC], no. 21272/03, 2 November 2010
[Salabiaku v. France](#), no.10519/83, 7 October 1988, Series A no. 141-A
[Salduz v. Turkey](#)[GC], no. 36391/02, ECHR 2008
[Şaman v. Turkey](#), no. 35292/05, 5 April 2011
[Sapunarescu v. Germany](#) (dec.), no. 22007/03, 11 September 2006
[Saric v. Denmark](#) (dec.), no. 31913/96, 2 February 1999
[Saund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17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Schenk v. Switzerland](#), 12 July 1988, Series A no. 140
[Scheper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39209/02, 5 April 2005
[Schmautzer v. Austria](#), 23 October 1995, Series A no. 328-A
[Schneider v. France](#) (dec.), no.49852/06, 30 June 2009*
[Schwarzenberger v. Germany](#), no. 75737/01, 10 August 2006
[Sejdovic v. Italy](#)[GC] no. 56581/00, ECHR 2006-II
[Sekanina v. Austria](#), no.13126/87, 25 August 1993, Series A no. 266-A
[Seleznev v. Russia](#), no. 15591/03, 26 June 2008
[Seliwiak v. Poland](#), no. 3818/04, 21 July 2009
[Sequeira v. Portugal](#) (dec.), no. 73557/01, ECHR 2003-VI
[Shanno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67537/01, ECHR 2004-IV
[Sibgatullin v. Russia](#), no. 32165/02, 23 April 2009
[Sidabras and Diautas v. Lithuania](#), (dec.), nos.55480/00 and 59330/00, 1 July 2003
[Silickienė v. Lithuania](#), no. 20496/02, 10 April 2012
[Sipavičius v. Lithuania](#), no. 49093/99, 21 February 2002
[Soering v. the United Kingdom](#),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61
[Solakov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no. 47023/99, 31 October 2001,

ECHR 2001 - X

[Sofri and Others v. Italy](#) (dec.), no. 37235/97, ECHR 2003-VIII

[Stanford v. the United Kingdom](#), no.16757/90, 23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2-A

[Stitic v. Croatia](#), no. 29660/03, 8 November 2007

[Stoichkov v. Bulgaria](#), no. 9808/02, 24 March 2005

[Stojkovic v. France and Belgium](#), no. 25303/08, 27 October 2011

[Stow and Gai v. Portugal](#) (dec.), no.18306/04, 4 October 2005*

[Suhadolc v. Slovenia](#) (dec.), no. 57655/08, 17 May 2011

[Suküt v. Turkey](#), (dec.), no. 59773/00, 11 September 2007

[Sutter v. Switzerland](#), no. 8209/78, 22 February 1984

[Szabó v. Sweden](#) (dec.), no.28578/03, 27 June 2006

[Tabaï v. France](#) (dec.), no. 73805/01, 17 February 2004*

[Tarău v. Romania](#), no. 3584/02, 24 February 2009*

[Taxquet v. Belgium](#)[GC], no.926/05, ECHR 2010

[Teixeira de Castro v. Portugal](#), 9 June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V

[Telfner v. Austria](#), no. 33501/96, 20 March 2001

[Thomann v. Switzerland](#), 10 June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II

[Thomas v. United Kingdom](#) (dec.), no. 19354/02, 10 May 2005

[Tierce and Others v. San Marino](#), nos. 24954/94, 24971/94 and 24972/94, ECHR 2000-IX

[Tirado Ortiz and Lozano Martin v. Spain](#) (dec.), no. 43486/98, ECHR 1999-V

[Toeva v. Bulgaria](#) (dec.), no. 53329/99, 9 September 2004

[Topic v. Croatia](#), no. 51355/10, 10 October 2013

[Trepashkin v. Russia \(no. 2\)](#), no. 14248/05, 16 December 2010

[Trofimov v. Russia](#), no. 1111/02, 4 December 2008

[Twalib v. Greece](#), 9 June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V

[Ubach Mortes v. Andorra](#) (dec.), no. 46253/99, ECHR 2000-V

[Ucak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44234/98, 24 January 2002

[V.v. Finland](#), no.40412/98, 24 April 2007

[V.v. the United Kingdom](#)[GC], no. 24888/94, ECHR 1999-IX

[Vacher v. France](#), 17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19 April 1994, Series A no. 288

[Van Geyseghem v. Belgium](#)[GC], no. 26103/95, ECHR 1999-I

[Van Mechele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23 April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

[Vanyan v. Russia](#), no. 53203/99, 15 December 2005

[Vaudelle v. France](#), no. 35683/97, ECHR 2001-I

[Vayiç v. Turkey](#), no. 18078/02, ECHR 2006-VIII (extracts)

[Vera Fernández-Huidobro v. Spain](#), no. 74181/01, 6 January 2010

[Veselov and Others v. Russia](#), nos. 23200/10, 24009/07 and 556/10, 11 September 2012

[Vidal v. Belgium](#), no.12351/86, 22 April 1992, Series A no. 235-B

[Vidgen v. the Netherlands](#), no. 29353/06, 10 July 2012

[Viorel Burzo v. Romania](#), nos. 75109/01, 12639/02, 30 June 2009*

[Visser v. the Netherlands](#), no. 26668/95, 14 February 2002

[Vladimir Romanov v. Russia](#), no. 41461/02, 24 July 2008

[Vronchenko v. Estonia](#), no. 59632/09, 18 July 2013

[W.S.v. Poland](#), no. 21508/02, 19 June 2007

[Walchli v. France](#), no. 35787/03, 26 July 2007*

[Welke and Białek v. Poland](#), no. 15924/05, 1 March 2011

[Wemhoff v. Germany](#), 27 June 1968, Series A no. 7

[Wierzbicki v. Poland](#), no. 24541/94, 18 June 2002

[Włoch v. Poland](#) (dec.), no. 27785/95, 30 March 2000

[X.v. Austria](#), no. 6185/7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May 1975, DR 2, pp. 68 and 70

[X.v. Belgium](#), no. 7628/7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9 May 1977, DR 9, p. 169

[Y v. Norway](#), no. 56568/00, ECHR 2003-II (extracts)

[Y.B.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48173/99 and 48319/99, 28 October 2004*

[Zagaria v. Italy](#), no. 58295/00, 27 November 2007*

[Zana v. Turkey](#), 25 Nov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Zarouali v. Belgium](#), no. 20664/92,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9 June 1994, DR 78

[Zdravko Stanev v. Bulgaria](#), no. 32238/04, 6 November 2012

[Zhuk v. Ukraine](#), no.45783/05, 21 October 2010

[Zhupnik v. Ukraine](#), no. 20792/05, 9 December 2010

[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62902/00, ECHR 2003-XII

[Zoon v. the Netherlands](#), no. 29202/95, ECHR 2000-XII